



清 乾隆 銅胎琺瑯石榴式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清 康熙 銅胎畫琺瑯粉紅地山水文盒（無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乾隆年製

清 乾隆 銅胎畫琺瑯仿成窯蓋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乾隆年製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海棠式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乾隆朝粵海關成做之「廣琺瑯」*

施靜菲**、王崇齊***

【摘要】本文旨在釐清粵海關成做的清宮「廣琺瑯」面貌，並進一步觀察清宮與粵海關成做琺瑯之互動關係，以此案例探索清代宮廷造辦處與地方成做機構在工藝製作上的運作模式。第一個目標是藉由分析陸續公布的清宮檔案、清冊，以及國立故宮博物院保存的清宮舊藏木匣及實物，探求乾隆時期清宮造辦處交辦粵海關成做「廣法瑯」之實物範圍，修正我們過去對廣東銅胎畫琺瑯之狹隘認識。並且往前追溯康熙、雍正朝進宮廣匠及廣琺瑯作品的紀錄，作為補充清代早中期廣州地區琺瑯製作的材料。第二個目標則在觀察清宮內務府造辦處與粵海關成做琺瑯之互動關係，並將之放到清盛期宮廷造辦處與地方成做機構之運作脈絡中，進行分析。這之中不但有經濟成本考量、善用地方之工藝資源，更可見到宮廷謹造風格與地方樣式之間的交流（衝突、融合），讓我們見識宮廷與地方互動之豐富層次。

本文主要的貢獻在於，重新定位一批在過去被誤認為清宮造辦處自製的銅胎畫琺瑯，其實是廣東粵海關所成做的清宮「廣琺瑯」作品。而由本研究歸納所得的清宮「廣琺瑯」風格特徵，是重建廣東地區畫琺瑯製作完整面貌的重要材料；清宮「廣琺瑯」的研究也啟發我們重新檢討，宮廷藝術研究或外銷藝術研究向來各自獨立、沒有交集的觀點，思考它們在藝術史發展中的定位。另一方面，從宮廷與地方互動角度來思考的粵海關成做「廣琺瑯」，除了在具體實物風格與運作規制方面皆可作為一材料豐富、具有研究潛力的案例外，還可成為未來深入探究盛清時期宮廷與地方互動之重要基礎或參照對象。

關鍵詞：清宮、宮廷、地方、畫琺瑯、粵海關、廣琺瑯、洋琺瑯

＊ 本文為本人所執行一百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的部分成果，初稿曾在國立臺灣大學舉辦的「宮廷與地方：乾隆時期的視覺文化」國際研討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主辦，2011年12月15-16日）中宣讀，並獲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賴惠敏教授之評論指導，獲益良多。本文之研究材料多依賴國立故宮博物院近年執行數位典藏資料庫建置計畫之成果，在此特表感謝。論文完成稿之撰寫為本人與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博士生王崇齊共同研究之成果，在成稿期間，除了多次共同討論切磋外，王生還負責了本文有關粵海關成做琺瑯款識部分的撰寫以及三個重要表格之製作，故並列為共同作者。交稿後，承蒙兩位審稿人之指教，並提供寶貴意見，在此表示感謝。然若本人有任何錯誤，文責由作者自行負責。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博士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言

畫琺瑯原本在工藝美術範疇中並非主流的研究領域，十八世紀晚期於清宮建立的畫琺瑯製作系統，包含四種胎質，金屬胎（圖1、2）、瓷胎（圖3）、玻璃胎、宜興胎。這幾年在清宮藝術研究浪潮中，隨著檔案資料的大量公布、對清宮收藏脈絡以及東西交流議題的關注，以清宮畫琺瑯為主體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清宮的畫琺瑯工藝在康熙晚期建立，起初受歐洲畫琺瑯作品啟發，參酌原來掐絲琺瑯及瓷器的相關工藝進行試驗，又有來自廣州的原料、人員、技術之加入，及後來直接得自西洋的原料、窯爐技術與人員，在盛清時期達到極高的工藝成就。①

目前有關清宮畫琺瑯的相關研究焦點，大多放在清宮畫琺瑯在內務府造辦處中的製作脈絡。從活計檔的紀錄、陳設檔案之清冊、清宮舊藏木匣以及1925年清室善後委員會清點紫禁城文物後出版的《故宮物品點查報告》等資料，我們清楚得知，在紫禁城最重要宮殿乾清宮的配殿中，造辦處製作之畫琺瑯作品（包括金屬胎畫琺瑯、玻璃胎畫琺瑯、宜興胎畫琺瑯、瓷胎畫琺瑯），與景德鎮御窯廠成做的「洋彩」及粵海關成做的「廣琺瑯」一起並列陳設，然後兩者相對較少受到關注。這樣的研究現況，對清宮畫琺瑯的整體研究以及東西文化交流面貌之釐清，都有相當大的侷限。因為無論在檔案或實物上，我們都看到，清宮畫琺瑯的製作，至遲從乾隆時期開始，瓷胎畫琺瑯的製作除了在北京之外，在景德鎮御窯廠展開所謂「洋彩」瓷器之製作；而關於銅胎畫琺瑯的

① 1970年代Hugh Moss從清宮畫琺瑯的角度研究清宮舊藏畫琺瑯實物（Hugh Moss, *By Imperial Command: An Introduction to Ch'ing Imeperial Painted Enamels* (Hong Kong: Hibiya Company Ltd, 1976))。國立故宮博物院在1978年舉辦「畫琺瑯」特展，針對所藏的畫琺瑯作品進行基礎整理（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清代畫琺瑯特展目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4〕）。1980年代後來陸續有兩岸故宮研究者進行論述，例如楊伯達，〈康熙款畫琺瑯初探〉，《故宮博物院院刊》，1980年第4期，頁42-48；朱家溍，〈清代畫琺瑯器製造考〉，《故宮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3期，頁67-76、96；張臨生，〈試論清宮畫琺瑯工藝發展史〉，《故宮季刊》，第17卷第3期（1983），頁25-38。而結合相關檔案發表、科學化驗成果以及清宮工藝研究成果之最新著作，可參見拙著，《日月光華：清宮畫琺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2）。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製作，位於廣州的粵海關亦受命成做「廣琺瑯」。這些在地方手工業中心製作的精製限量作品送回清宮後，與其他在北京上彩燒製的清宮畫琺瑯作品一起，被集中陳設收儲，其重要性不容忽視。

再者，清宮畫琺瑯的珍貴作品原本僅限於宮中使用，除少數賞賜給朝中大臣及蒙古、西藏貴族之外，外人難得一見。讓人以為深藏清宮、由皇帝親自指導的畫琺瑯，雖然工藝成就高，但在藝術史發展過程中，並未發揮更大的作用。但事實上，從清宮畫琺瑯發展之案例所見，由北京造辦處延伸到景德鎮與廣州，宮廷與地方彼此之間，在人力、原料及技術之密切交流，對於清代中國釉彩燒製工藝有極大的推進，不僅對清代工藝美術本身的發展有關鍵性的影響，甚至在外銷藝術領域亦發揮一定的作用。因為景德鎮與廣州，不僅是宮廷造辦處在地方的延伸，本身也是地方手工業中心，在國內民間市場以及外銷市場都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這些層面，在目前的研究中皆未見有深入的討論。

與景德鎮御窯廠相關實物方面的具體風格分析，可參見近年來廖寶秀及余佩瑾兩人關於乾隆洋彩及雍正琺瑯彩瓷的相關著作。2008年國立故宮博物院舉辦《華麗彩瓷：乾隆洋彩》特展，展覽圖錄中，策展人廖寶秀有關琺瑯彩、洋彩的一系列研究成果，為清宮收藏之釉上彩瓷器部分提供紮實的基礎資料，從清宮檔案、清宮舊藏木匣及實物進行詳細分析，提出在景德鎮加彩燒造的「洋彩」與於清宮加彩燒製的「磁胎畫琺瑯」作品之區別，主張使用清宮檔案中確定的名稱，認為應當將景德鎮加彩燒造送入清宮收儲於「乾清宮琺瑯器皿內」庫房的「磁胎洋彩」作品稱為「洋彩」。② 該研究引起一定的關注，不同產地之同性質作品生產，讓我們進一步思考宮廷與地方工藝造作分工與交流等問題；而「洋彩」名稱之使用及作品之比附，亦啟發學界對不同品類作品名稱釐清之迫切需要。③ 余佩瑾近年來對景德鎮官窯的研究，在多篇專論及博士論文的研究中，將清宮造辦處與景德鎮之間、乾隆皇帝與督陶官唐英之的密切互動

② 廖寶秀，〈附錄：端凝殿、養心殿磁胎洋彩及其製作年代〉，《華麗彩瓷：乾隆洋彩》（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頁10-30。

③ 拙著（與彭盈真合著），〈從文化脈絡探討清代釉上彩名詞：「琺瑯彩」、「洋彩」與「粉彩」〉，《故宮學術季刊》，第29卷第3期（2012年春季），頁1-7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清晰呈現，為宮廷與地方互動提供重要的研究根基。④

然而，相對於近來頗有研究進展的景德鎮御窯廠「洋彩」瓷器，盛清時期粵海關成做宮廷交辦銅胎畫琺瑯的運作情況與實物風格，相對較不明朗。在清代宮廷與地方間原料、技術與人員等交流中，粵海關成做宮廷交辦活計，有其特出之處。因為粵海關的所在地，不僅是當時重要的外銷藝術手工業中心，並且是經海路對外交流的重要窗口，因此其情況又比景德鎮御窯廠要來得複雜，牽涉層面更廣，值得特別關注。廣州作為清代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廢馳海禁後重要對外口岸、乾隆二十二年（1757）一口通商政策後之唯一海貿商港，廣州率先引進許多西洋工藝製作技術的問題，一直被提及，然由於資料的限制，清代早中期廣州手工業作坊的面貌及起迄時代，都不十分清楚；在具體實物缺乏的情況下，大多仰賴零星的文獻記載來窺探廣州手工產業的可能景況。有關廣州地區琺瑯手工業生產、贊助與流通之認識也不例外，大多數的研究，都集中在十八世紀到清晚期大量外銷的銅胎畫琺瑯（圖6），研究者以西方學者為主，通常是介紹中國工藝美術史時，略有涉獵；或是論及廣東外銷藝術及外銷藝術品在歐洲市場的使用脈絡時，⑤ 順道一提。也有著作已注意到廣東琺瑯的基本特色以及其在風格上與外銷瓷器的密切關係。⑥ 少數學者如福開森（John C. Ferguson），意識到廣東地區生產的琺瑯與北京造辦處製作的琺瑯之

---

④ 余佩瑾，〈唐英與雍乾之際官窯的關係——以清宮琺瑯彩瓷的繪製與燒造為例〉，《故宮學術季刊》，第24卷第1期（2006年冬季），頁1-44；〈匠外之作—從唐英《陶成紀事碑》看雍正官窯燒造及帝王品味的問題〉，《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9），頁414-427；〈清乾隆《陶冶圖冊》的繪製背景與創作意圖〉，《故宮文物月刊》，第326期（2010），頁14-23；《乾隆官窯研究：做為聖王的理想意象》（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1）。

⑤ R. Soame Jenyns and William Watson, *Chinese Art, Minor art II: gold, silver, later bronzes, cloisonné, Cantonese enamel, lacquer, furniture, wood* (Oxford: Phaidon, 1980); Margaret Jourdain and R. Soame Jenyns, *Chinese Export Ar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Country Life Limited;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0).

⑥ 參見The Chinese porcelain company ed, *Chinese Painted Enamels of the 18th Century* (The Chinese porcelain company, 199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間存在差異，對於風格及品質略有描述。⑦ 事實上，除此之外，廣州地區琺瑯製作還有一與清宮畫琺瑯密切相關之面向，不論檔案或實物材料皆很豐富，但是這個角度過去甚少被注意。再者，相較於過去我們對廣州製作琺瑯之認識多集中在十八世紀後半以後，清代早中期廣州地區琺瑯手工業的資料相對匱乏，狀況不明，本文主要探討的粵海關成做清宮「廣琺瑯」，因為有關清宮畫琺瑯材料相對較為豐富，對釐清廣州地區琺瑯手工業早期發展，將有所助益。

特別針對清宮「廣琺瑯」之專題研究，目前尚未見到。Hugh Moss在*By Imperial Command*一書中，稍微論及廣東的琺瑯作坊，認為從相關資料來看，廣東地區的琺瑯作坊早期應該是獨立發展，且較北京年代早；提示我們必須注意廣東的琺瑯作坊，除了外銷及國內市場外，還有帶官款送到宮廷的作品。⑧ 其他相關論述，大多是兩岸故宮的研究人員整理典藏中與廣東相關藏品時，觸及此議題。朱家溍在綜論清代畫琺瑯時，從所見之實例及文獻，提示清代畫琺瑯的製作地點除了北京清宮造辦處之外，還有揚州（《揚州畫舫錄》中記錄的琺瑯名匠王世雄），以及廣東（選送琺瑯匠入京以及北京故宮藏銅胎畫琺瑯燈帽中有「粵東祥林店」牌記為證）。⑨ 楊伯達在討論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清代廣東貢品時，認為廣東琺瑯作坊或許可被視為造辦處的外地分部，除了選送畫琺瑯匠人入京外，還必須送進當地或外洋的琺瑯料，⑩ 並提示乾隆時期廣東製作銅胎畫琺瑯風格，包括模仿宮廷樣式、受歐洲風格影響樣式等（圖7、8），

---

⑦ 福開森在1937年中國藝術概論書籍中，就提到中國的畫琺瑯可分為兩類，一是北京造辦處製作的琺瑯，一是廣東製作主要外銷的廣東琺瑯（Canton Enamels），並評論後者的質量較差（John C. Ferguson, *Survey of Chinese Art*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9), vol.10, pp. 127-128）。

⑧ Hugh Moss從清宮畫琺瑯的角度研究清宮舊藏畫琺瑯實物（Hugh Moss, *By Imperial Command*, pp. 53-54.）；Micahel Gillingham則主要在Soame Jenyns的研究基礎上，嘗試對1978年在Ashmolean Museum 舉辦中國銅胎畫琺瑯之展出作品，進行風格分析與編年，並依品質或款識判斷宮廷及非宮廷性質。參見Michael Gillingham, *Chinese Painted Enamel* (Oxford: Ashmolean Museum, 1978).

⑨ 朱家溍，〈清代畫琺瑯器製造考〉，頁73。關於揚州的情況，一來資料缺乏，二來非本文篇幅所能顧及，有待未來再探討。

⑩ 楊伯達編，《清代廣東貢品》（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1987），頁6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外，楊伯達另有專文論及檔案中廣東工匠在清宮造辦處活動的情況。⑪ 陳夏生在對國立故宮博物院明清琺瑯器綜論研究時，最後一個部分大略提到，廣東貢進琺瑯器的概況及清宮舊藏實物的列舉（圖9、10）。⑫ 雖然兩位學者已注意到，清宮檔案中下令粵海關成做琺瑯之事實，然當時所舉列的作品，多限於帶有「大清乾隆年製」六字款的作品；尚未意識到清宮舊藏「乾隆年製」四字款的銅胎畫琺瑯作品中，有大量應屬於粵海關成做的「廣琺瑯」作品。

此外，宮廷與地方互動關係在活計成做制度方面的研究，近來倒是逐漸受到重視，許多研究成果對本文討論清宮造辦處與廣東粵海關之間研究，提供了具體材料或思考方向之重要基礎。例如德國馬普學會科學研究所與北京故宮合作出版的《宮廷與地方：18－19世紀技術的交流與互動》，收集了六篇以清宮檔案和舊藏文物為材料、討論宮廷與地方技術交流互動關係的論文，其中與本文較為相關的，是與景德鎮或廣東有關的兩篇論文。許曉東從陸續公布清宮檔案資料的爬梳，試圖理出康熙、雍正時期清宮與粵海關造辦「廣琺瑯」的關係，並對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有了初步的輪廓。⑬ 王光堯亦從制度面出發，重建康熙、雍正時期江西景德鎮御窯廠的瓷器燒造與內務府之關係，並嘗試提出所謂「內外一體化」的運作方式，來強調兩者之間的緊密聯繫。⑭ 此外，余佩瑾對於乾隆官窯的研究，也從曾經在內務府服務後來外任淮安關監督兼管責景德鎮窯務的年希堯，以及乾隆皇帝與唐英的互動，來考慮景德鎮御窯的角色。⑮

---

⑪ 楊伯達，〈從清宮舊藏十八世紀廣東貢品管窺廣東工藝的特點與地位—為《清代廣東貢品展覽》而作〉，《清代廣東貢品》（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1987），頁21-22；楊伯達，〈十八世紀清內廷廣匠史料〉，《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年報》，第18期（1987），頁124-127。

⑫ 陳夏生，《明清琺瑯器展覽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9）。

⑬ 許曉東，〈康熙、雍正時期宮廷與地方畫琺瑯技術的互動〉，《宮廷與地方：17至18世紀的技術交流》（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頁277-335。

⑭ 王光堯，〈雍正時期御窯制度的建設〉，《為君難：雍正其人其事及其時代》（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0），頁389-404；王光堯，〈乾隆時期御窯廠的管理體制與官樣制度〉，《宮廷與地方》（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頁31-76。

⑮ 余佩瑾，〈唐英與雍乾之際官窯的關係——以清宮琺瑯彩瓷的繪製與燒造為例〉，頁1-44；《乾隆官窯研究：做為聖王的理想意象》（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從畫琺瑯的製作所看到的宮廷與地方互動現象，最重要的關鍵，就是清代內務府造辦處造作中宮廷與地方之間的運作模式，北京與景德鎮、北京與廣東之間的往來互動，使得地方的原料、人力（包括技術）得以為宮廷所用，而清宮畫琺瑯的風格及規制，亦因之傳佈到宮闈之外。在這當中，除了主管機關、經費來源等制度面運作的考量、以及廣東工匠技術居中的技藝傳遞外，中介人（在內務府經過種種經歷磨練、擁有各項技藝的資深官員，被拔擢短期外派或長期外任到地方擔任重要關差）在燒造內容及成品風格形成中，所扮演的實質角色，亦不容忽視。陳國棟對內務府造辦處外任、外派官員的之研究分析發現，內務府造辦處的行政體系中，內務府官員外派或外任到地方擔任重要關差之運作模式，對本文探討宮廷與地方工藝製作之互動關係，亦有很大的助益。⑯

綜上所述，雖然先前之研究相對缺乏，且相關材料零星分散，然在前人的基礎上，加上近年清宮相關檔案的公布，使得粵海關成做「廣法瑯」這個議題，有了進一步發展的契機。在這樣的脈絡下，本文之討論集中在三個面向：一是利用對清宮中廣東工匠的活動、清宮舊藏廣琺瑯的相關紀錄之具體掌握，補充我們對清代早中期廣州地區琺瑯手工業之理解；二是從清宮舊藏實物、木匣、陳設檔案，嘗試重建乾隆時期粵海關成做「廣法瑯」之實物範圍，修正過去對廣東銅胎畫琺瑯製作之狹隘認識，作為未來研究廣東琺瑯工業的重要基礎；三是由清宮畫琺瑯與粵海關成做廣琺瑯之間的互動（人員、原料、制度）角度出發，進一步探討清宮與粵海關之間在工藝成做上的運作模式，並將之放到盛清時期宮廷造辦處與地方成做機構之脈絡中觀察。希望這個粵海關成做「廣琺瑯」之案例，可成為未來思考清宮與地方在其他物品製作互動之重要基礎或參照對象。而有鑑於粵海關之地理位置及在中國對外海貿上的特出地位，除了宮廷與地方工藝製作的交會外，未來還可延伸到重新考察宮廷、地方以及外銷藝術之重要依據。

此外，有關本文使用名詞的定義，在此先做說明。從造辦處成做制度及清宮分門別類收藏之角度來說：景德鎮御窯廠製作的「洋彩」（瓷胎）與粵海關

⑯ 參見陳國棟，〈內務府官員的外派、外任：與宮廷文物供給之間的關係〉，《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三十三期（2012），頁225-26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成做的「廣法瑯」（銅胎）應該也算是廣義清宮畫琺瑯的一環，除了原料、技術性質相同外，它們受命在地方成做完成後，被送回清宮配上木匣，與其他在北京製作的各材質畫琺瑯一樣，都被放入乾清宮法瑯器皿內的庫儲點。然而，同時，從宮廷與地方互動的角度來考量，「洋彩」與「廣琺瑯」或許另立一類來觀察，更為恰當，因為發布命令或發樣到地方稅關成做，與內務府造辦處直接在北京的作坊中製作，畢竟不是一回事。在地方成做的「洋彩」與「廣琺瑯」，仍有本身在製作過程中條件上的限制，也與當地手工業原有的製作傳統，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例如人員的訓練、原料、設備、外派官員的監督以及本地工匠對宮廷發來樣稿的理解等。因此，在本文中，雖同意「洋彩」與「廣琺瑯」為廣義清宮畫琺瑯的一環，但在討論中，使用加上引號的「清宮畫琺瑯」時，指的是在北京造辦處中加工上彩燒製的狹義「清宮畫琺瑯」，更強調其與地方成做作品間的差異，以期釐清兩者不同之風格特點。

再者，過去一般十八世紀到清晚期廣州地區大量生產、外銷的琺瑯器被西方學者稱為Canton或Cantonese enamel，譯為「廣東琺瑯」。廣義來說，廣東地區製作的琺瑯器亦皆可稱為廣東琺瑯；然本文中之主要討論對象為粵海關造辦成做的清宮舊藏廣東琺瑯，因為清宮的相關文獻檔案及清宮為其特別製作的木匣刻款，都名之為「廣琺瑯」，故將此批清宮舊藏的廣東琺瑯稱為「廣琺瑯」，以顯示其與清宮之特殊關係。另外，與此相關的還有「洋琺瑯」或「西洋琺瑯」的名稱，從清宮檔案的脈絡來看，「西洋琺瑯」定義並不十分一致，原先可能用來指涉傳入的歐洲琺瑯作品，但後來在檔案中，「西洋琺瑯」大多用在對比掐絲琺瑯時出現，指涉與西洋技術相關的畫琺瑯、內填琺瑯等。而根據木匣刻款及《內務府造辦處成做活計清檔》之紀錄，廣東地區製作的銅胎畫琺瑯（包含少數內填琺瑯）主要被稱為「廣琺瑯」，然經過分析比對，清宮舊藏木匣刻款定為「洋琺瑯」的作品，從風格及款識來看，也應該都是粵海關奉命成做後送進清宮的，因此在本文中與「廣琺瑯」視為同一品類一起討論，也應屬粵海關成做「廣琺瑯」。⑰ 且在本文最後附表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

⑰ 但究竟「廣琺瑯」與「洋琺瑯」實際區分之依據為何，筆者目前尚未有較圓滿之解釋，雖然活計檔案的描述中提供給我們「廣琺瑯」與「洋琺瑯」區別的資訊，包括做法、顏料、裝飾等線索，但從實物風格上，目前並無法確實判別其與「廣琺瑯」之間的差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廣琺瑯」作品中，也包括有原來在清宮木匣刻款為「銅胎畫琺瑯」或「銅胎琺瑯」之部分作品，經本文之研究後，認為它們從風格及款識皆應屬「廣琺瑯」，疑為清宮定名時有不一致之狀況，或刻款時間落在正式的「廣琺瑯」名稱出現之前，故予以重新定名。如此說來，我們在閱讀檔案及文獻時必須注意前後文，才能判斷這些名稱真正之指涉對象。然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清宮舊藏廣東琺瑯中，還有為數不少的地方自行進貢之無款作品，這些作品與廣東大量外銷之作品相似，裝飾風格及器形無法明顯區別，因此將其視為廣義的廣東琺瑯，而不列入與「清宮畫琺瑯」關係密切的「廣琺瑯」範圍來討論。

一、清前期廣州的銅胎畫琺瑯產業

廣州是盛清時期中國與西洋透過海路交流之重要前哨站，眾多舶來品及外來原料皆在此地集散，來自歐洲的傳教士和使節團也多經由廣州轉往內地，十七世紀晚期以降，許多新興的科技、藝術即透過此地再輾轉傳到他地，從我們前面提到的一些文獻紀錄也大略可以窺知其重要地位。雖然康熙年間資料留存極少，但是從文獻與實物來看，我們可以確定當時廣東地區不但有許多西洋琺瑯進口，並且已經開始燒製畫琺瑯；⑱ 廣東送進清宮的貢單中亦經常有西洋

別，此問題有待未來有進一步確切的資料後，再行解決。又檔案中及木匣上所用之「廣琺瑯」之「琺」字也不統一，有時寫做「法」，有時寫做「珐」或「琺」，為求一致，除引文外，本文重訂之品名，皆統一採用現代慣用的「廣琺瑯」。

⑱ 如前所述，廣東本地資料缺乏，從下文所列清宮所存之奏摺檔案，可從旁窺見當時廣東琺瑯工藝發展概況。另外也有西方學者從西文材料來探求此問題，其中Soulie de Morant認為，畫琺瑯技術由傳教士於1683年首先介紹到廣東，1685年技術被帶到北京，於1685和1719年間為法國‘Compagnie de Chine’公司製做畫琺瑯（Soulie de Morant, *Histoire de l’art Chinois*, p. 23；轉引自Margaret Jourdain and R. Soame Jenyns, *Chinese Export Ar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 53）。然其文獻依據並不清楚，或許也考慮到康熙二十三年（1683）弛海禁之時間點。另參見R. Soame Jenyns & William Watson, *Chinese Art, Minor Art II: gold, silver, later bronzes, Cloisonné, Cantonese enamel, lacquer, furniture, wood*, p. 14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琺瑯的相關紀錄。⑲ 而我們在《粵海關志》的關稅清單中，也透過徵稅資料窺見當時粵海關徵收「洋法藍」與當地土產琺瑯之稅額紀錄，例如《粵海關志》卷二〈稅則二〉：「法藍器：大土燒法藍器、洋小法藍器每件各稅四分，小土燒法藍器每件稅二分。各色法藍器：洋法藍器、自鳴鐘每個稅四兩、洋法藍標每個稅八錢、洋法藍酒杯、洋法藍小菜碟每個各稅兩錢、土法藍片盤每件稅八分」。⑳

康熙五十五年（1716）廣東巡撫楊琳的奏摺即明白點出，廣東當時的琺瑯製作已有一定的基礎。〈廣東巡撫楊琳奏報訪送燒琺瑯人及西洋人進京等情摺〉（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初十日）：「廣東巡撫奴才楊琳為呈驗事。奴才訪得廣城能燒法藍一名潘淳，原籍福建，住家廣東，試驗所製物件頗好。奴才令其製造法藍金鈕，欲連人進呈內廷效力。……奴才隨與安頓家口，并帶徒弟黃瑞興、阮嘉猷二人，隨李秉忠一同赴京。所有潘淳燒成法藍時辰表一個，鼻煙壺兩個，鈕子八十顆，合先呈驗。」㉑

另一段後續資料，〈廣東巡撫楊琳奏送西洋人並琺瑯匠人進京等情摺〉（康熙五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廣東人潘淳能燒琺瑯物件，奴才業經具摺奏明，今又查有能燒法藍楊士章一名，驗其技藝，較之潘淳次等，亦可相幫潘淳製造。……再奴才覓有法藍表、金剛石戒指、法藍銅畫片、儀器、洋法藍料并潘淳所製法桃紅顏色的金子攙紅銅料等件，交李秉忠代進，尚有已成打底子未畫、未燒金紐坯亦交李秉忠收帶，預備到日便於試驗。合先具摺同李秉忠奏摺進呈，謹奏。」㉒

根據雍正二年兩廣總督孔毓珣的奏摺指出，其前任督官楊琳送進京效力的廣東籍琺瑯匠，多達十一人；由前述相關文獻可知，被送進宮的潘淳、楊士章

⑲ 楊伯達，〈從清宮舊藏十八世紀廣東貢品管窺廣東工藝的特點與地位—為《清代廣東貢品展覽》而作〉。

⑳ 梁廷枏，《粵海關志》稅則二，卷九（廣州：廣東人民 版社，2002），頁175。

㉑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北京：檔案出版社，1985），冊7，頁422。

㉒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冊7，頁451-452。此文獻首見呂堅舉引（呂堅，〈康熙款畫琺瑯瑣議〉，《故宮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3期，頁93-9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等人不但能自行煉料，也有能力燒製琺瑯，帶著原料、半成品、成品及技術入京效勞。㉓ 當時清宮的畫琺瑯尚在試驗階段，來自廣東的具體協助相當關鍵，在康熙造辦處畫琺瑯建立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㉔

在西方的脈絡中，「畫琺瑯」（painted enamelware）一般主要是指在金屬胎表面以琺瑯料彩繪後，以低溫燒製而成的器物或裝飾嵌片，畫琺瑯技法首先在法國出現，約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左右。製作時通常先在金屬胎（大多是銅胎）表面及器內燒上一層底色釉，施以顏料彩繪後再經燒製而成，顏色通常鮮豔亮麗，呈現像油畫般的效果，內容大多為肖像畫及人物故事等題材（圖11），經常使用銅版畫作為稿本。畫琺瑯是一種綜合型的複雜工藝，金屬胎製作完成後就要準備燒琺瑯，燒製琺瑯過程中最重要的就是顏料的煉製、上彩及燒製等工序。畫琺瑯在清宮中代表一項新的工藝類別，在清宮承繼前代的工藝傳統中是沒有的，這些畫琺瑯作品主要是在內務府造辦處轄下製作，整套新的製作系統（包括原料煉製，上彩與燒製）在北京的玻璃廠及琺瑯作等相關作坊中設置。㉕ 由造辦處相關作坊送來金屬胎、玻璃胎、景德鎮瓷胎和江蘇宜興陶胎

㉓ 雍正二年七月初九日〈兩廣總督孔毓珣奏承養內廷效力工匠家屬摺〉:「竊照前任督臣楊琳任內承養內廷效力法瑯匠楊士章等十一人，俱家住廣東，向來各匠家屬，每季赴總督衙門領取養家銀兩，各匠在京房屋、飯食俱為供備，逐日進內廷做工。今臣蒙聖恩補授兩廣總督，循照舊例，在京在廣一體給養，理合奏明，謹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冊3，頁299。）該文獻事由之相關分析見王竹平，〈金紅彩料在康熙時期琺瑯彩瓷的使用情形〉，《金成旭印》（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3），頁299-300。

㉔ 筆者在楊伯達對十八世紀廣匠研究及王竹平對康雍時期廣匠分析的基礎之上，補充相關資料，將曾經活動於造辦處琺瑯作的廣匠整理成表，以供參考（表一）。楊伯達，〈十八世紀清內廷廣匠史料〉，頁119-137；王竹平，〈金紅彩料在康雍時期琺瑯彩瓷的使用情形〉，頁298-313。

㉕ 有關北京玻璃廠煉琺瑯料之研究，可參見王光堯之考證，認為至遲在康熙五十九年，清宮內務府就有自行煉料之紀錄，引用乾隆年間海望奏摺中提到：「玻璃廠委署催總永泰，在廠監造玻璃、燒煉琺瑯二十餘年，頗為熟悉」（鐵源、李國榮主編，《清宮瓷器檔案全集》（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2008），卷2，頁53）。（王光堯，〈雍正時期御窯制度的建設〉，頁389-40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後，將玻璃廠煉製或由西洋傳來、景德鎮等地送來之彩釉顏料，施彩於這四種不同的材質上，再因應不同的材質，在燒製方式及及燒成氣氛和溫度上作調整，進行燒製而成。如前所述，乾隆時期開始，清宮畫琺瑯製作系統從宮廷向外擴張到地方，瓷胎有一部分完全在景德鎮上彩、燒製的「洋彩」（圖4），銅胎也有一部分是發樣到粵海關，成做後送進宮中的「廣琺瑯」（圖5）。

又康熙五十七年（1718），九月初九日兩廣總督楊琳恭進琺瑯匠役事的奏摺提到：

> 「有廣州監生龍洪健、民人林朝鍇、何嘉璋等稟稱：洪健等粗知法琅，祈試驗手藝，應否送京效力等語。奴才即傳進衙門，令其製造，所製白料潔白光亮，紅料鮮明。今製成積紅杯盤一對，蓋碗一對，畫片八件，呈樣。龍洪健等三人隨帶製就白料一百二十觔，紅料一觔，於九月初九日，差人送京應役。為此奏聞」。㉖

奏摺中所提到的廣匠林朝楷，後來還成為郎世寧的門生，在造辦處中擔任畫琺瑯的重要工作。㉗ 從這些記載中可窺見廣東地區琺瑯製作在工匠、煉料及成品方面，都已有一定的規模，派駐在廣東的地方官員，除了負責採辦西洋琺瑯及琺瑯料舶來品外，還協助尋找優秀工匠、琺瑯料以及地方製好的成品送到北京。此外，雖然後來發展的狀況不明，但廣東玻璃廠也在康熙晚期設立，根據學者的研究指出，1699年當法國海神號（*l'Amphitrite*）商船抵達廣州時，不僅帶來相當數量的玻璃製品，還有法國皇家玻璃廠的要員三人，以及八名玻璃工匠；後來廣東地區的玻璃廠也在法國傳教士白晉（Jochin Bouvet，1656－1730）

㉖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北京：檔案出版社，1984-1985），冊8，頁326。

㉗ 該紀錄首見朱家溍摘錄。朱家溍，〈清代畫琺瑯器製造考〉，頁69。雍正六年《活計檔》〈雜錄〉:「七月十一日，員外郎唐英啟怡親王、為郎世甯徒弟林朝楷身有癆病，已通過呈子數次，求回廣調養，俟病好時，再來京當差。今病漸至沉重，不能行走當差等語。奉王諭：著他回去吧！遵此」(《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三冊，〈雜錄〉，頁423)。與此紀錄相關後續可參見《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三冊，雍正六年八月，頁425。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的建議下，由法國耶穌會主導成立。㉘ 不過由於資料缺乏，具體運作情況不明朗，從前述有關廣東工匠攜帶西洋及自行煉製的琺瑯料入京之相關紀錄來看，推測廣東地區的玻璃廠除了製做玻璃相關製品外，極可能也有進行煉製琺瑯料的工作。英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實驗室針對館藏東西方陶瓷及銅胎畫琺瑯顏料著色劑之比對分析中，一個主要的結論就是，金屬胎與瓷胎的上彩顏料皆得力於玻璃廠琺瑯顏料的煉製，一些中國文獻也支持這樣的看法，雖然少數作品的化驗並不全然一致支持此看法。㉙

換句話說，在康熙朝清宮畫琺瑯之建立時期，清宮與廣東畫琺瑯製作之間，在人員、原料、技術上都保持有密切關係。觀察清宮畫琺瑯的建立，尤其是康熙五十五年（1716）之後，宮中的畫琺瑯製作除原有參與試驗的瓷器與掐絲琺瑯相關匠人之外，還得到前述廣東工匠之生力軍，後來又有來自歐洲藝匠陳忠信、郎世寧等人的協助，在技術上及稿樣的設計上得到極大的突破與發展。㉚ 與早期實驗性作品相較，顯現出技術上的飛躍，在上彩、燒製以及稿樣設計上都達到極高的水準，與過去的相關作品不論是釉上彩瓷或是掐絲琺瑯相較，都有更活潑生動的表現，並奠立了以黃地花卉為主的皇家畫琺瑯典範（圖1）。值得注意的是，器內普遍施加湖藍釉的特點（在歐洲畫琺瑯中不見，可能來自原來掐絲琺瑯以藍色為主要裝飾色彩的影響），在後來雍正、乾隆時期的清宮畫琺瑯，以及景德鎮「洋彩」，以及粵海關「廣琺瑯」中被繼承。

除了康熙朝送進會燒琺瑯的廣匠之外，雍正時期亦有廣東琺瑯匠在造辦處活動的紀錄。例如雍正三年二月初五日，〈記事錄〉：「造辦處字與廣東巡撫

㉘ E. B. Curtis, *Glass Exchange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1550-1800* (Farnham, England;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9), pp. 42-44.

㉙ Rose Kerr, "What were the Origins of Chinese *Famille Rose?* " *Orientations*, vol.31, no.5 (2000 May), pp. 53-59. 其他的結論還包括有：1.特定的一些顏料，例如粉紅色，應該來自歐洲的影響。歐洲的文獻也支持這樣的看法，不過化驗的結果顯示這樣的影響似乎在19世紀比較明顯，因為其中的錫（歐洲粉紅色中常見的）成分，中國要到十九世紀才見到。2.從掐絲琺瑯來的顏料對中國清代瓷器釉上彩有很大的影響。王竹平注意到此化驗結果還得出景德鎮粉彩瓷所用粉紅畫琺瑯料與金屬琺瑯的廣琺瑯粉紅料有關聯性，而與粉紅玻璃器較無關聯。王竹平，〈從科學分析文獻回顧看琺瑯彩、洋彩與粉彩的分類與命名〉，《故宮學術季刊》，第29卷第3期（2012年春季），頁133。

㉚ 拙著，《日月光華：清宮畫琺瑯》，頁44-63。

國立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為知會事：正月二十七日，怡親王奏准廣東巡撫年希堯，法琅匠張琪在廣每年原安家銀一百二十兩，今內減銀二十兩，仍給安家銀一百兩。欽此。為此知會」。[31] 我們因而可以推估，康熙、雍正時期送進內務府造辦處的廣匠，對造辦處的琺瑯製作技術具體產生一定的作用。而潘淳所製帶進宮的「法桃紅顏色的金子攙紅銅料」，或是前述「龍洪健等三人隨帶製就白料一百二十觔，紅料一觔」，應當也大大地擴充了造辦處琺瑯作坊的顏料調色盤。[32]

然康熙、雍正時期廣東地區製作的琺瑯留存實物不多，或許又因為不帶款識，時代判定上也存在一定的難度。前面引用的相關文獻中，提到潘淳等人帶進清宮的「已成打底子未畫、未燒金紐杯」，以及林朝楷等人帶進清宮的「（霽）紅杯盤一對，蓋碗一對，畫片八件」，這些文獻中提到的實物面貌，目前並無法完全確認。但從少數零星作品，我們或許可以推測這個時期廣東琺瑯的遺物；另一個辦法或可由乾隆時期的相似作品，來推想早期的可能面貌。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收藏中有一件無款〈清康熙（廣東）銅胎畫琺瑯粉紅地山水圖盒〉（圖12），盒內外均施半透明粉紅色釉為地，盒面及盒底釉上繪有青綠山水圖，顏料鮮豔、對比強烈，風格不同於當時康熙朝的其他作品。該作品的千字文號為列-360-51，原應置放於前述大宗清宮畫琺瑯集中地點端凝殿中，查對《故宮物品點查報告》中該千字文號的品名為「銅胎畫琺瑯小盒」3件，備註「帶蓋康熙御製內扁盒無款」。[33] 其中無款扁盒指的應該就是這件作品（其他兩件都有款），我們從其風格表現以及乾清宮《琺瑯玻璃宜興磁胎陳設檔》（道光十五年七月十一日立）中，在康熙銅胎畫琺瑯作品的清單中，有「銅胎廣琺瑯小盒一件（吊瑯）」之敘述，「吊瑯」（「吊」為「掉」之俗字），特徵與此件作品亦相類，推測此盒極可能為廣東作坊製作入貢清宮之作品。

---

[31]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雍正三年二月，〈記事錄〉，頁677。依照當時照辦處中，一般工匠的薪資來看，每年安家銀一百兩或一百二十兩都是很高的數字，可見來自廣東的琺瑯匠張琪受到看重。楊伯達，〈十八世紀清內廷廣匠史料〉，頁124-127。

[32] 有關清宮畫琺瑯中使用帶有黃金成份的相關顏料之討論，見王竹平，〈從科學分析文獻回顧看琺瑯彩、洋彩與粉彩的分類與命名〉，頁141-144；王竹平，〈金紅彩料在康熙時期琺瑯彩瓷的使用情形〉，頁298-313。

[33] 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北京市：線裝書局，2004），第二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雍正時期的廣琺瑯實物作例也不多，乾隆朝四十一年《活計檔》提到太監榮世泰交廣法瑯托盤二件雍正款之紀錄：「（十一月）二十九日員外郎四德來說，太監榮世泰交廣法瑯托盤二件雍正款，傳旨，將托盤認看呈覽，欽此。隨將托盤認看得係銅鍍金，呈覽。奉旨，著配法瑯盃二件亦要雍正款，欽此。於四十五年五月初九日將法瑯托盤二件配得法瑯盃二件，呈覽。奉旨，着配楠木匣，得時交乾清宮，欽此」。[34] 不過所謂「廣法瑯托盤二件」之實物究竟為何，我們目前尚未能確認。此外，根據許曉東的統計，除了雍正四年（1726）十二月二十日有太監賈弼交來「廣琺瑯多末壺一對」之紀錄外，雍正六年九月十一日兩廣總督孔毓珣到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粵海關副監督鄭伍賽共八年五十份貢單中，廣東貢琺瑯的紀錄僅四項，分別是琺瑯鼻煙壺、琺瑯帽架及洋琺瑯茶杯兩件，數量極少。[35] 北京故宮博物院有一件帶「雍正年製」款的黃地琺瑯鼻煙壺（圖13），另藏有數件定為清中期無款的帽架，風格接近乾隆時期的廣琺瑯，這些作品或許可讓我們推想當時廣東進貢琺瑯之樣貌。此時清宮中廣東琺瑯數量稀少的原因，也有可能是清宮畫琺瑯的製作穩定、技術成熟，暫時並不需要廣東進貢大量的畫琺瑯作品。但是若要在現存的實物風格上明確指出，此時期廣東銅胎畫琺瑯的風格，目前因為樣本太少，尚難評估。而且我們也別忘了，康熙、雍正時期清宮琺瑯作中的大多數工匠亦來自廣東，在繪製手法上，或許也難以輕易辨別。

文獻中亦有康熙晚期時皇帝自信清宮畫琺瑯之成功，不需要地方再呈進琺瑯或琺瑯顏料的許多紀錄。例如康熙五十七年（1718）兩廣總督楊琳的謝恩摺：「奴才從前止知琺瑯出自外國。今見皇上御制，精巧鮮明，遠勝外國百倍」；又前述同年兩廣總督楊琳奏為恭進琺瑯匠役事摺（送進龍洪健、林朝楷等人），康熙皇帝硃批：「法瑯大內早已造成，各種顏色俱以全備，但奏摺中九月內差人送京之語，到京之時再試看」。[36] 又如康熙五十八年（1719），閩浙總督覺羅滿保奏進西洋什物呈覽，康熙皇帝硃批：「選幾樣留下，琺瑯等物宮中所造

---

[34]《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41，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琺瑯作〉，頁260。

[35] 許曉東，〈康熙、雍正時期宮廷與地方畫琺瑯技術的互動〉，頁323。

[3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8冊，頁342；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匯編》，第8冊，頁32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已甚佳、無用處，嗣後無用找尋」。㊲ 雖然當時清宮不依賴廣東地區琺瑯的呈進，但不代表廣東畫琺瑯製作的發展有所停滯，許曉東引用了雍正《奏銷檔》中一條重要的紀錄提示我們，在雍正晚期廣東作坊仿做清宮黃地琺瑯作品，幾可亂真，相關成品還在京城販賣，顯示當時廣東製作琺瑯的能力不容忽視。雍正十二年（1734）十月十九日：

> 「奴才海望謹奏，為請旨事，查養心殿造辦處所製珐琅物件均係上用、賞用之項，內外臣工蒙皇上施恩賞賜外，諸人不可濫用。近聞市有出賣珐琅黃色器具如鼻煙壺、翎管等件，恐係造辦處匠役人等偷出售賣，因令管番役官員稽查。今據郎中何瞻、員外郎尚林稟稱，職等差番役頭目高連魁等查得，市內有賣珐琅器皿之人，其黃色鼻煙壺、翎管數十件，細究其出處來歷，據稱廣客販賣。因將廣客傳問，據稱，此項珐琅器具出於廣東省太平門外長壽庵製造，等因呈稟前來。伏思黃色器不唯民間不得擅用，即翎管一項乃是皇上加恩行賞之物，猶當鄭重，亦不可仿效製造。今若不禁止，久恐無知小人唯圖覓利擅造違禁之物貨賣，應請行文廣東總督，將製造黃色珐琅等物嚴飭禁止，其在京師內市賣者，亦令該處嚴行禁止可也。為此謹奏請旨，等因繕折，於雍正十二年十月初十日奏事郎中張文彬等轉奏。本日面奉諭旨：是。欽此」。㊳

當時燒造的黃色琺瑯鼻煙壺、翎管實物面貌，因目前並未有實物留存，不甚清晰，或也可由前述雍正款黃地鼻煙壺之類的作品，得以窺見（圖13）。而文中所提到畫琺瑯作坊的地點，大約在廣州十三行舊址北邊長壽寺（長壽西路）附近，此寺廟目前已經不存，但附近有絲綢工會「錦綸會館」，乾隆年間廣彩工會「靈思堂」的館址也在附近。推測當時廣州許多手工業作坊可能都集中在那附近，清末民初的琺瑯工坊則聚集在現在大新路一帶，離長壽寺也不遠。㊴

㊲ 《宮中檔案康熙朝奏摺》，第9輯，頁724-725。該資料為莊吉發教授在國立師範大學授課時提及由陳玉秀告知，在此表示感謝。

㊳ 《奏銷檔》185-085-1，轉引自許曉東，〈康熙、雍正時期宮廷與地方畫琺瑯技術的互動〉，頁318-319。

㊴ 參見黃聖芝，《廣彩外銷瓷研究》（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頁84-8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上我們利用了有限的文獻及實物，分析了清前期廣東銅胎畫琺瑯手工業的大略情況，包括康熙、雍正時期廣東送入琺瑯工匠、原料、成品與半成品之鏈結，並將廣東畫琺瑯放入康熙晚期清宮建立新藝術品類畫琺瑯之大框架中，釐清其在實驗創燒發展過程中可能扮演的重要角色及位置。檔案資料也顯示，在此之後，這樣的互動交流往後持續進行，清宮畫琺瑯作坊與廣東的琺瑯產業之間在各方面都有所聯繫。然而，到了乾隆時期，這樣的情況發生重要的轉折，原來集合來自地方及西洋的人力、原料及技術後，清宮畫琺瑯在康熙晚期的成功燒製，顯然為清宮畫琺瑯的發展奠立了新的製作系統與風格典範；爾後持續發展，隨著乾隆時期將琺瑯之製做逐漸轉移到地方，宮廷規制、風格反過來在地方發生影響力。以下我們就具體風格表現及制度面分別來論述乾隆時期粵海關「廣琺瑯」的活計成做。

二、乾隆時期粵海關與「廣琺瑯」活計成做

自乾隆時期開始，畫琺瑯的製作系統有了極大的變革，從清宮造辦處反向逐漸往地方手工業中心傳佈風格與相關技術。我們看到畫琺瑯真正根生成為清宮的重要藝術形式，在清宮樹立新的製作規制及風格傳統。不論是康熙朝色地花卉（黃色地為主），器內施湖藍釉的標準銅胎畫琺瑯風格（圖1），還是雍正時期山水或花鳥畫搭配詩句及印章的瓷胎畫琺瑯典型風格（圖3），都成為畫琺瑯工藝的重要代表，引領潮流。如前所述，學者們已論述過清宮畫琺瑯與景德鎮瓷器生產之間存在的緊密聯繫，例如琺瑯彩技法及原料向景德鎮御窯廠的傳佈，與景德鎮原有的技術結合，尤其是與畫琺瑯發展同一系統、一同被收儲陳設在乾清宮配殿的「洋彩」系列作品，最能顯現與清宮畫琺瑯之密切關係。[40]而廣東銅胎畫琺瑯的製作情況，又是如何？就如前述雍正十二年的《奏銷檔》紀錄所見，原來在康熙晚期技術上領先一步的廣東銅胎畫琺瑯，反而要模仿清宮畫琺瑯的風格以取得市場。

---

[40] 相關著作，可參考廖寶秀，〈乾隆磁胎洋彩綜述〉，《華麗彩瓷--乾隆洋彩》（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8）；余佩瑾，《乾隆官窯研究：做為聖王的理想意象》；拙著（與彭盈真合著），〈從文化脈絡探討清代釉上彩名詞：「琺瑯彩」、「洋彩」與「粉彩」〉，頁1-74。

臺灣藝術期刊資料庫

在前一章節中，我們已經提示了清前期宮廷與廣東之間互動的形式，包含原料、工匠與實物之間的流動。在此，我們將焦點轉到乾隆時期，而從數量上來看，乾隆時期可說是粵海關成做宮廷用琺瑯之盛期，清宮造辦處的檔案中，經常可見到發樣粵海關、要求製作琺瑯送進宮中之紀錄。至遲在乾隆十三年，內務府造辦處就開始向粵海關發樣，陸續要求製作琺瑯呈進，從實物或文獻來看，這個機制至少一直持續到乾隆晚期甚至嘉慶年間，廣東地區都持續成做宮中所需的畫琺瑯作品。《活計檔》乾隆十三年十二月〈粵海關〉：「二十六日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交西洋法瑯表套一件。傳旨：此法瑯表套做法不像西洋做法，像廣東做法。廣東既做得來，為何不做大瓶大罐呈進，欽此。於十四年正月初七日，司庫白世秀達子將西洋法瑯表套一件畫得表底花樣一張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照此表上法瑯片樣式一樣畫大瓶大罐，先畫樣呈覽，准時，交粵海（關）成做，欽此。於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員外郎白世秀司庫達子將粵海關送到銅胎鍍金法瑯大瓶大罐各一對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進訖」。㊶ 可見得廣東能夠製造畫琺瑯的能力，在乾隆時期開始逐漸受到清宮的重視，約乾隆十三年前後，粵海關即經常受命製作琺瑯送進宮中，之後雖然間有要求粵海關無需多燒造之紀錄，但由粵海關成做宮廷所需琺瑯呈進，已逐漸成為常態之活計，到乾隆中晚期甚至成為清宮畫琺瑯中銅胎畫琺瑯的主要供應地。而後來為了與在北京製作的「清宮畫琺瑯」有所區隔，出現正式用在清宮相關檔案及木匣刻款的「廣琺瑯」名稱，來指涉粵海關成做後送進宮廷的銅胎畫琺瑯。

我們可從檔案資料及實物，來窺見乾隆時期清宮與粵海關之間緊密的互動關係。以下分四個部份來探討粵海關成做清宮「廣琺瑯」制度面之問題：

（一）人員的交流

有關人員的交流，主要是廣匠的選送與粵海關監督的派任。然而在乾隆時

㊶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6，乾隆十三年十二月，〈粵海關〉，頁170。而與送進前述畫琺瑯成品差不多同時，乾隆皇帝下令：「傳旨：粵海關所進琺瑯瓶罐，俱各無款，嗣後再做瓶罐送來，必要刻款，欽此。」(《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7，乾隆十四年十二月，〈粵海關〉，頁102。)。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 期刊資料庫

期，前者的執行，也主要由粵海關監督來執行，因此，本節的討論主要還是集中在粵海關監督的角色。在乾隆朝粵海關成做「廣琺瑯」的實際執行過程中，粵海關監督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如同康熙、雍正時期的地方官員（例如廣東巡撫、兩廣總督）要負責尋找人才、物品等事務；另一方面則要執行內務府造辦處交辦之成做任務。有關找人才的事項，安排送進地方人才及相關物品。例如《活計檔》乾隆十一年四月〈粵海關〉：「再廣琺瑯活計，嗣後不必多燒造，尋覓西洋法瑯器皿呈進。欽此」。㊷ 又同年八月〈粵海關〉：「初八日內大臣海望奉上諭，粵海關此次所進貢物平常，不過廣東所造法瑯活（計）器皿之屬，俱係京內所有的，嗣後或將上好的珠子買些，或京內所少西洋器皿玻璃法瑯等件買些，□不致虛糜錢糧。欽此」。根據陳國棟之歸納分析，辦貢可分為例貢、節貢與傳貢三類，費用由派駐地方的關差張羅，上貢之物品自然也由他們蒐集或進行把關。㊸ 蒐羅的舶來品與成做的物品，通常隨貢進入宮廷中。

《活計檔》中有不少關於廣匠的相關紀錄，例如乾隆四年四月十九日〈琺瑯作〉：「七品首領薩木哈將廣東監督鄭伍賽進來畫法瑯人六名、每人畫得法瑯片二片，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㊹ 乾隆六年又有指名招募三名廣匠的命令，根據楊伯達的統計此時造辦處中的廣琺瑯匠有十人之多（參見表一）。㊺ 而此時不僅琺瑯作中廣匠占絕大多數，造辦處中廣匠相對於清宮內務府造辦處其他匠作中的南匠，亦明顯有廣匠逐漸取代江南地區匠人的趨勢，㊻ 結合前述

㊷《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4，乾隆十一年四月，〈粵海關〉，頁438-439。

㊸ 陳國棟，〈內務府官員的外派、外任：與宮廷文物供給之間的關係〉，頁248-262。另有關粵海關監督的角色與功能，可參見陳國棟，〈清代前期粵海關監督的派遣（1683-1842）〉，《史原》，第10期（1979），頁139-168及陳國棟，〈粵海關的利益分配：粵海關監督的角色與功能〉，《食貨月刊》，復刊第12卷（1982），頁19-33。

㊹《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9，乾隆四年四月，〈琺瑯作〉，頁129-130。

㊺ 楊伯達，〈十八世紀清內廷廣匠史料〉，頁124-127。

㊻ 例如嵇若昕爬梳《活計檔》中有關宮廷牙匠的資料，觀察廣東牙匠地位的轉變（嵇若昕，〈十八世紀宮廷牙匠及其作品研究〉，《故宮學術季刊》，第23卷第1期〔2005〕，頁467-530）。另可參見嵇若昕，〈乾隆朝內務府造辦處南匠薪資及其相關問題研究〉，收於陳捷先、成崇德、李紀祥主編，《清史論集》，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519-575。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康熙晚期廣匠進京開始，我們看到廣匠在造辦處琺瑯作中一直受到重視。這些入京的琺瑯廣匠，將地方最新的技藝源源不斷地傳入宮中；而宮廷在品味及製作規制的嚴格要求，也同時馴化了他們原有的地方風格，他們可說是宮廷與地方在工藝技術交流上最具體的執行者。

從乾隆十五年開始，中央直接派遣內務府官員擔任粵海關監督。[47] 而這些內務府官員出任的粵海關監督，其與造辦處相關的工作範圍，除了前述所見，持續安排送進地方人才及相關物品外，還涵括了成做內務府負責之重要活計。粵海關監督承辦乾隆皇帝交辦的多項重要任務中，最著名的就是乾隆二十九年開始進行的〈平定伊犁等處得勝圖〉（以下簡稱得勝圖）銅版畫製作。〈得勝圖〉銅版畫製作計畫最早在乾隆二十九年下令開始，《活計檔》〈如意館〉：「十一月初五日接得郎中德魁、員外郎李文照押帖一件，內開十月二十五日太監胡世傑傳旨平定伊犁等處得勝圖十六張著郎世寧起稿得時呈覽，陸續交粵海關監督轉交法郎西稚國，著好手人照稿刻做銅板，其如何做法，即著郎世寧寫明一併發去，欽此。」[48] 整個製作過程困難度高，且歷時很長；光是粵海關監督就換了四任，歷經方體浴、德魁、李文照與圖明阿等四名。[49]

根據陳國棟的研究，從內務府被外派到重要海關的關差，通常都是資深的內務府官員，在造辦處中歷任過許多要務，尤其是大多皆曾在重要做坊如意館中當差，深識皇帝的品味與造辦處的要求，他們除了可能作為宮廷在地方搜集資訊的情報人員外，也是重要的協調者，在經辦造辦處活計方面，比起一般的地方官員，更能將皇帝的品味及要求與地方的工藝製作協調地融合一起，製作出符合皇室要求的作品。[50] 粵海關關差也不例外，例如前述的李文照、德魁等人，都是探討宮廷與粵海關成做活計關連的關鍵人物，他們一方面有能力貫徹皇帝交辦的任務，一方面也在地方發揮重要的影響力，將他所熟知的宮廷風

---

[47] 有關粵海關關差之派遣參見陳國棟，〈清代前期粵海關監督的派遣（1683－1842）〉，《史原》，第10期（1979），頁139-168。

[48]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28，乾隆二十九年，〈如意館〉，頁825-826。

[49] 參見莊吉發，〈得勝圖—清代的銅版畫〉，《故宮文物月刊》，15期（1984），頁102-109；陳國棟，〈內務府官員的外派、外任：與宮廷文物供給之間的關係〉，頁238-239。

[50] 陳國棟，〈內務府官員的外派、外任：與宮廷文物供給之間的關係〉，頁225-27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格及規制，有意或無意傳播到地方之相關作坊中。曾經在內務府服務後來被外派負責景德鎮窯務的前後任督陶官年希堯、唐英，也前後曾經到過廣東任官，年希堯在雍正年間曾經擔任廣東巡撫，而唐英曾擔任粵海關監督（乾隆十五到十六年經歷一年多的時間），[51] 並且是第一位正式的內務府官員擔任粵海關監督。對本文來說，更重要的是，在此短暫的任期中，唐英與粵海關成做造辦處交辦活計制度之確立是否有關？乾隆十五年的這個時間點，也與前述乾隆十三年粵海關開始有制度地承辦清宮「廣琺瑯」成做活計之時段接近，在此時派遣唐英赴粵，負擔粵海關成做造辦處交辦活計制度建立之重責，是相當有可能的作為。而由此延伸，唐英的到任，除了制度的建立外，是否也促成景德鎮成做「洋彩」與廣州成做「廣琺瑯」之經驗交流，包括琺瑯上彩、燒製等技術、煉製原料，甚至裝飾風格等方面，是我們較關心的問題，也是可以再深入探討的問題。

（二）原料與配方之交流

與前述康熙、雍正朝情況相似，廣東地區的琺瑯製作有著與西洋技術直接連絡之管道，原料與配方也經常有獨立發展的脈絡；到乾隆時期，做得比宮中好的琺瑯顏料，以及調和粉紅色顏料必須使用的強水等原料，也應命送進宮中。乾隆《活計檔》〈行文〉「（四十二年五月）初四日，副都統金輝面奏，看得廣東西洋法瑯料比較京內西洋法瑯料寶色、水頭俱各鮮明，奏請向德魁要些亮紅、亮綠各樣顏色西洋法瑯料送來，以備成做西洋法瑯活計應用。奉旨：准向德魁要。欽此。於十一月十三日，員外郎四德、五德將粵海關監督德魁送到西洋法瑯顏料六十四斤八兩，交太監如意呈進交法瑯處，訖」。[52]

---

[51] 傅振倫等編，〈唐英瓷務年譜長編〉，《景德鎮陶瓷》，1982年第2期，頁19-20；莊吉發，〈雕鏤賦物：唐英督陶文獻〉，《故宮文物月刊》，129期（1993），頁62-71。另有關唐英相關著作及文獻紀錄之整理，可參見張發穎主編，《唐英全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8）。

[52]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40，乾隆四十二年五月，〈行文〉，頁20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乾隆《活計檔》中也經常有要求粵海關採辦與琺瑯顏料相關原料的紀錄，例如乾隆三十三年〈琺瑯作〉：「……做套紅玻璃瓶須用硇水，因武英殿無有，欲向粵海關監督德魁要用等情，交胡世傑奏，奉旨，着照好樣式准做二對，其硇□水准向德魁要，欽此。於本年七月二十七日粵海關監督德魁送到硇水二瓶，重四十二兩重四十八兩」。[53] 又乾隆四十年閏十月〈記事錄〉中即記載三十七年及四十年都曾經要求粵海關採辦調和粉紅色顏料的強水送京運用。[54] 強水為調和特殊的粉紅色顏料需要的化學溶劑，應該是由歐洲傳來，至於當時廣東是否也能夠自行製作？過程如何？目前未見相關研究。

（三）發樣成做之執行模式

而前述文字也透露了，清宮造辦處責成粵海關成做琺瑯的執行模式，先在北京造辦處中畫樣呈覽（包括花紋與器形，有時候只有器形），批准後再發樣到粵海關成做，從畫樣呈覽、發樣粵海關，到成做完成送到北京，費時約一年。[55] 在楊伯達考察乾隆時期的廣東貢物情況時，也提到相關紀錄，乾隆十四年二月五日傳諭兩廣總督碩色：「嗣後粵海關凡做琺瑯、象牙、玳瑁器皿、并咖石輪器皿、油畫片以及不合款式格子桌等件，俱不必進來，俟發給式樣時，再做進來。」[56] 該紀錄顯示，從先前到乾隆前期，廣東持續有呈進入貢地方製作或進口的各項工藝品，包括琺瑯。

同時，乾隆皇帝仍對廣東手工業技術表示肯定，要求往後依照宮廷發樣製作，始符合宮廷制樣要求。此訊息更加強了廣琺瑯與清宮之緊密關係，依遵宮廷式樣製作。陳國棟引用軍機處奏摺檔案指出，乾隆十七年兩廣總督阿里衮在辦理為乾隆皇帝祝壽的「萬壽貢」時，論及廣東匠作貢入清宮的器用式樣不完

---

[53]《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31，乾隆三十三年二月，〈琺瑯作〉，頁529。

[54]《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38，乾隆四十年閏十月，〈記事錄〉，頁727。

[55] 然從《活計檔》的紀錄來看，一般造辦處琺瑯作中的法瑯活計，從傳旨到做成，大約兩個月（此訊息有賴故宮博物院古器物部研究人員楊勇之提示）。

[56]《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7，乾隆十四年，〈傳諭碩色嗣后粵海關廣做器皿不必進務要洋做〉，頁705。該文獻首見楊伯達，〈清乾隆五十九年廣東貢物一瞥〉，《故宮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3期，頁3。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全吻合宮廷樣式與品味需求，應該發給式樣，方能「敬謹製辦，庶無錯誤」之請求。[57] 這些相關紀錄與上述「廣琺瑯」成做，必須在造辦處中畫樣呈覽、再發樣粵海關之執行模式，有密切相關。

而說到實際發到粵海關的樣稿，應當包括畫樣、實物樣、木樣等檔案中提到的種類，[58] 而在許曉東的相關著作中首度公開發表了乾隆時期的琺瑯畫樣，上有黃籤墨書「洋琺瑯碟壹件，口徑三寸、高六分」（圖14），[59] 當時發往粵海關的樣稿很可能就是這個模樣。

到乾隆晚期，清宮的畫琺瑯活計逐漸衰退，北京宮廷中的琺瑯相關作坊以製作掐絲琺瑯為主；而粵海關成做琺瑯活計愈加興盛。根據楊伯達之考察，乾隆四十五年以後，文獻記載中就顯示出銅的來源出現很大的問題，後來琺瑯處在五十四年時，甚至被歸併。[60]「琺瑯處現在無活計，將官員達他匠役人等俱歸併造辦處當差，至畫琺瑯人歸如意館當差，具首領太監歸乾清宮當差，欽此」。[61] 而乾隆六十二年十二月：「……做鐘處將應行補做，乾清宮陳設洋漆格鐘一架燙樣，呈大學士伯和御前大臣福看閱，奉諭鐘穰一分著做鐘處成做其五彩法瑯表盤交粵海關監督常福照樣成做，洋漆格子交蘇州織造舒璽照樣成做，速為趕辦，該二處具務於明七八月間，交送京內造辦處以備陳設，不可遲」。[62]

---

[57] 陳國棟，〈內務府官員的外派、外任：與宮廷文物供給之間的關係〉，頁242-244。

[58] 大多檔案提到的是畫樣，在此不另外列舉；下列乾隆四十年十一月，〈行文〉（《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38，頁664-665）畫琺瑯之系列傳做，送到粵海關的是實物樣；木樣之例可見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行文〉:「三十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來說，太監胡世傑傳旨：着傳與李永標造過的法瑯手巾束花樣，做開其里二件，先做樣呈覽，欽此。於二十四年正月十九日，員外郎金輝將做得開其里木樣一件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准照樣發往粵海（關）成做法瑯開其里二件，欽此」（《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23，頁618）。

[59] 許曉東，〈康熙、雍正時期宮廷與地方畫琺瑯技術的互動〉，頁313。

[60] 楊伯達，〈景泰款掐絲琺瑯的真相〉，《故宮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2期，頁20。

[61]《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51，乾隆五十四年九月，〈記事錄〉，頁333。同年十一月〈行文〉也記錄了要求粵海關送進成做琺瑯之例。《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51，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行文〉，頁263。

[62]《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清檔》，BOX No.154，乾隆六十二年十二月，頁49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到乾隆晚期，廣東除了受命成做琺瑯外，也繼續將琺瑯好手送進宮中，但數量較乾隆早期減少，也可見到製作銅胎畫琺瑯活計的中心由清宮琺瑯作（處）逐漸轉移到粵海關。《活計檔》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記事錄〉：「今據粵海關監督德魁揀選得好手法瑯匠黃念、黃國茂二名前來臣等隨試，看得伊等手藝尚堪應役，查法瑯匠馮舉、梁鴻泰原各食錢糧銀五兩，今新到法瑯匠二名所食錢糧可否照例，賞給之處繕寫摺片，並將黃國茂做得腰圓法瑯片一片、黃念做得長方法瑯片一片，一併持進交監胡世傑具奏。奉旨。黃念著啟祥宮行走，黃國茂在法瑯處行走，餘知道了，其腰圓法瑯片配做帶頭一件，長方法瑯片配做鍍金盒一件。欽此。」[63]

另有一項生動的記錄就說到，清宮造辦處畫琺瑯工匠無法負荷大量燒造畫琺瑯的要求時，請求發到粵海關成做，減輕造辦處的負擔。《活計檔》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廣木作〉提到：「於四月二十七日造辦處謹奏。據法瑯作員外郎栢永吉稟稱，成造紫檀木八方塔供養西洋法瑯畫片七百五十二片，約估得每片畫二遍、徑火三次，必須一工五分工，共計一千一百二十八工。但查現今畫法瑯只有黃國茂一人，按工合計約至三年有零方全完，且伊手內現有所畫淳化軒法瑯爐鍾碟等件，並每年應畫鼻煙壺、並畫賞用翎管等件，此項琺瑯畫片七百餘片如止令黃國茂一人繪畫必至遲滯，理合呈明辦理等語。伏思紫檀木塔內供養上法瑯畫片七百五十二件雖係小件活計，如交黃國茂一人繪畫又有別項應畫之活計，勢必日期延緩，在查如意館雖有法瑯匠謝遂、黃念二名，即將此二人撥與繪畫通計三人，尚須一年有餘，而謝遂、黃念等俱有別項應畫差務合無，奏請將此樣法瑯畫片發往粵海關監督德魁辦理，彼處匠投人既多，工價亦省，俾能早完此項活計。再查黃國茂手藝遲慢，每遇活計不能迅速，並請交談

---

[63]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35，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記事錄〉，頁559。據學者考證，紫禁城中的啟祥宮是造辦處重要作坊之工作處，我們一般較熟知的是「如意館」之名，如意館之藝匠包括有玉匠、牙匠、畫匠（還應包括有琺瑯匠）。如意館原為圓明園內的房舍之一，位於福園門內東側；當皇帝駐蹕於紫禁城時，在如意館中工作的人員移至紫禁域內啟祥宮服務，皇帝於初春遷往圓明園時，在啟祥宮的人員又移至如意館中當差。成豐十年（1860）英法聯軍焚毀圓明園時，如意館化為灰燼；同治年間（1862－1874）將紫禁域內的啟祥宮改名為太極殿。以上考證參見嵇若昕，〈乾隆時期的如意館〉，《故宮學術季刊》，第23卷第3期（2006年春季），頁127-152。

臺灣人文藝術期刊資料庫

處另覓好手法瑯匠一名送京更換，庶活計不得遲誤，而於錢糧不致虛糜矣。謹奏，請旨。等因持進交太監胡世傑轉奏，奉旨法瑯片交德魁往細緻裡燒造，黃國茂准其更換。欽此。」[64] 從此段描述來看，當時就已經有尋找代工之經濟因素考量，考慮粵海關所在地區工匠充裕、工價低等經濟因素，而將活計送往該處成做。

粵海關成做活計時，也同宮中造辦處一樣，經常有賞罰之事件紀錄，乾隆《活計檔》四十三年七月〈記事錄〉：「初八日將粵海關送到廣法瑯蓋碗一對、廣法瑯金胎鼻煙壺十二個、廣法瑯仿磁胎鼻煙壺十件、廣法瑯元盒八對。隨恭奏摺片一件內開查得，現在送到法瑯元盒與原交圓盒式樣大小均屬相符，惟盒內蓋底率照鏇膛未淨之木樣成做，故與原交盒樣不同，似此粗心均屬不合，相奏開除。將法瑯盒式樣仍交圖明阿小心再行成做十數件外，仍將圖明阿罰俸三個月；至五德代做木樣不詳細查看，致使盒內尚未鏇淨即付圖明阿領辦，請將五德亦罰俸三個月以懲。將來所有現在送到法瑯圓盒等件一並持進，交太監鄂勒里呈覽。具奏，奉旨，五德罰俸之處着寬免，圖明阿着罰俸三個月。將法瑯盒仍交圖明阿，照青花白地、黃地五彩圓盒花紋另做十數件，再新配做法郎蓋碗一件週身有火霞，交圖明阿，仍用此胎股另往好裡燒造來，做樣碗交茶房，其茶房鼻烟壺俟進宮時呈覽，欽此。於七月十七日將金胎鼻烟壺十二件、磁胎鼻烟壺十件呈進訖。於十二月十五日將粵海關送到法瑯蓋碗一對元盒大小六對，呈進訖」。[65]

此外，從相關紀錄中，對粵海關傳辦琺瑯中不同之性質，亦有所說明。乾隆四十三年《活計檔》提到：「（五月）二十六日，員外郎四德、五德來說，太監榮世恭傳旨，粵海關辦賞用法瑯瓶罐盤碗，嗣後不必辦做矣，傳時再做。如有已得者，隨貢進來，不許再做，其特傳做法瑯器皿，仍照樣成做，陸續送來。欽此」。[66] 由此史料我們也看到當時粵海關造辦貢進琺瑯有「一般賞用」

---

[64]《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35，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廣木作〉，頁149-150。

[65]《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41，乾四十三年七月，〈記事錄〉，頁327-328。在楊伯達考察廣東貢物時，也提到乾隆二十一年對粵海關降旨，駁回之貢物受罰不得開銷之紀錄。楊伯達，〈清乾隆五十九年廣東貢物一瞥〉，頁3-10。

[66]《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41，乾隆四十三年五月，〈行文〉，頁4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與「特傳」之分，乾隆時期的檔案中，時有賞賜廣琺瑯之例，[67] 可能屬「一般賞用」例貢之作，而本文所舉之例大多為「特傳」之傳辦物件。[68]

而前述論及從宮廷發樣到粵海關成做活計，後來可能又考量到發給式樣不夠精確，最好是直接派任內務府之人來「指授做法」，在風格式樣及品味上，方能更貼近內廷之要求。根據學者考證，在唐英出任粵海關監督之前，從北京派任來的內務府包衣劉山久，已經在粵海關負責相關造作及辦貢事務一段時間。[69] 而如前所述，唐英在乾隆十五年時，作為第一位內務府包衣出任粵海關監督，時間雖短，但在相關紀錄中，亦可窺見他所致力之改革，包括預支備貢銀辦貢，以及成辦活計對預算之有效掌握。[70] 推測唐英在任粵海關監督一年多的任期間，即可能將他在景德鎮奠立「洋彩」製作規製，於粵海關複製。

以上粵海關造辦畫琺瑯與北京造辦處之間制度設計與運用，顯示了宮廷與地方在工藝造作上的結構關係，讓我們清楚見到廣東與北京、地方與宮廷之間密切互動的生動圖像。包括以下幾點：一、人力資源之支援，粵海關監督由內務府官員出任，確實掌控「廣琺瑯」的成做，將皇帝的品味及要求與地方的工藝製作協調地融合，製作出符合皇室要求的作品。同時也持續選送廣東工匠，到位於北京的內務府造辦處服務，他們是宮廷與地方在工藝技術交流上具體的執行者。二、原料與配方之交流，造辦處要求粵海關送進燒較好的琺瑯原料及特殊配方。三、發樣成做、賞罰分明。考量廣東製作琺瑯的能力有一定的水準，且當地工匠充裕、薪資低，發樣要求粵海關成做畫琺瑯送進宮中；對粵海關成做琺瑯活計比照造辦處作坊賞罰分明等。這些現象看來，粵海關製作「廣琺瑯」，明顯就是清宮畫琺瑯的一環，其規制流程，亦即內務府造辦處的延伸。再者，從檔案及許多特傳製作的「廣琺瑯」送進清宮後，在乾清宮配匣，並與造辦處製作之畫琺瑯及御窯廠製作之「洋彩」並列陳設，我們推測這些粵海關造辦的特傳「廣琺瑯」，在清宮中亦得到一定的重視。

---

[67] 例如乾隆六十二年正月，〈記事錄〉中軍機處傳賞達賴喇嘛、班禪厄爾德尼之什物清單中，就有許多廣琺瑯的紀錄。

[68] 這樣的分際在作品風格上是否可以清楚分辨，值得特別注意。

[69] 有關劉山久在造辦處的當差狀況及時間，參見陳國棟，〈內務府官員的外派、外任：與宮廷文物供給之間的關係〉，頁243-245。

[70] 陳國棟，〈內務府官員的外派、外任：與宮廷文物供給之間的關係〉，頁242-2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另一方面，考量廣東地區在乾隆十三年左右正式受命成做琺瑯之前早就有琺瑯製作的基礎與傳統，甚至比清宮畫琺瑯的成立還早，我們因此有必要將粵海關成做「廣琺瑯」從清宮畫琺瑯中獨立出來討論。首先，若將粵海關受命成做的「廣琺瑯」與景德鎮御窯廠成做的「洋彩」對照來看，或可更清楚兩者之差異及各自的特色，兩者皆與清宮畫琺瑯有不可分的密切互動關係，與清宮畫琺瑯發展同一系統、一同被收儲陳設在乾清宮配殿中。從宮廷與地方的互動模式來看，相當類似，皆由內務府外派或外任的關差負責燒造成做，不過從相關紀錄來看，景德鎮御窯廠很顯然因為有一位積極的督陶官（唐英）長期經營，而表現出較大的主動性，唐英主導景德鎮「洋彩」的風格走向，雖然在技術及風格上亦與清宮畫琺瑯有淵源，但創新性相對較高，除了宮廷發樣外，唐英也經常自行提出新樣製作呈進。[71] 相較之下，「廣琺瑯」式樣主要來自清宮，通常在造辦處設計稿樣呈覽後，准後發樣至粵海關成做，除了有令要粵海關「自配花紋」外，器形及紋飾等樣稿皆由造辦處提供。[72] 上述有趣的對照，也可見到主導人物在此運作模式中的重要性，沒有強勢的主導人物，粵海關的「廣琺瑯」製作相對被動，作品器形及裝飾風格多數追隨清宮樣式，創新性有限；但相對來說，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得以見到宮廷樣式在地方的流佈，清宮工藝造作在地方所發揮的影響力，廣琺瑯之例更能貫穿我們對宮廷到地方風格傳佈現象的觀察。且從學者的研究中，我們得知檔案所記載景德鎮「洋彩」雖然可能更早就開始，但最主要的成做高峰是乾隆六年到九年，[73] 較粵海關成做的「廣琺瑯」的主要時期則稍晚（乾隆十三年以後），有時間前後之差異。

而上述這些分析中，我們也看到清宮派遣內務府官員到粵海關監督、成做宮廷所需文物之種種現象，造辦處將數量較大量之活計送往粵海關成做，也是成本與效率等經濟考量，考慮到粵海關所在地區工匠充裕、工價低等因素。而為求得符合宮廷式樣的物品，發樣到地方成做，甚至派遣內務府資深官員到地方監督造辦、指授做法，可能也是符合當時狀況的最佳選擇。

---

[71] 參見廖寶秀，〈乾隆磁胎洋彩綜述〉，頁10-30。

[72] 其中很大的原因，或許如同前述之討論，因為粵海關先前送進的成做物品，經常有不符宮廷樣式之情事所致。

[73] 廖寶秀，〈乾隆磁胎洋彩綜述〉，頁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清宮「廣琺瑯」的區辨

雖說在康熙、雍正時期我們就看到廣東琺瑯送進到宮中的一些紀錄或實物，但是廣琺瑯一詞原本廣泛指涉廣東製作的琺瑯，如前述康熙、雍正時期的相關紀錄，乾隆時期陸續進入清宮的一些「廣琺瑯」作品，應當也屬於這樣的脈絡，例如前述《活計檔》乾隆十一年四月〈粵海關〉的紀錄中：「再廣法瑯活計，嗣後不必多燒造」。而之後，隨著粵海關受命成做「廣琺瑯」逐漸成為定制，「廣琺瑯」一詞也就專指粵海關受命製作送進宮的銅胎畫琺瑯作品。在我們前面提到的乾清宮的《琺瑯玻璃宜興磁胎陳設檔》（道光十五年七月十一日立）中，即有許多登記為「廣琺瑯」之作品、目前收藏這些作品的木匣上之刻款（圖5），以及主要根據木匣上品名刻款而記錄的《故宮物品點查報告》，也都可以見到「廣琺瑯」一詞之正式使用。推測可能是在乾隆晚期為了製匣刻款，整理粵海關送進清宮的特傳琺瑯時，為了區別在清宮與廣東兩個不同產地製作的銅胎畫琺瑯，而使用了「廣琺瑯」的正式名稱。

但是一般根據外觀風格，絕大多數帶有「乾隆年製」宋體四字款的「廣琺瑯」作品，在過去都沒有被清楚地辨識出來，通常被籠統視為在清宮造辦處燒製的「銅胎畫琺瑯」之屬。因此，考察清宮中的廣琺瑯時，最根本的問題在於如何區辨出「廣琺瑯」。如果能在豐富的實物留存中挑選、區辨出更多的「廣琺瑯」樣本，那麼，論述的基礎就會更加穩固，我們對於「廣琺瑯」的理解就有可能更加深刻。因此，本節的主要目標之一，便是嘗試從清宮傳世作品中，推敲出「廣琺瑯」的特色，從而辨認出更多的廣琺瑯。接著，透過分類、解讀這些廣琺瑯的風格，更明晰廣琺瑯的特色，以增進對於「廣琺瑯」的理解，作為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礎。一方面可增加我們對廣東燒製琺瑯多元面貌的認識；一方面對於理解清宮畫琺瑯規制、風格與地方手工業中心的互動，具有關鍵性的幫助。

事實上，如前言所示，在此之前學者即針對清宮舊藏的畫琺瑯開始區辨廣琺瑯的嘗試，例如楊伯達在《清代廣東貢品》一書中，主要從風格出發，舉出清宮舊藏中廣東製作的銅胎畫琺瑯作品，並將乾隆時期廣東生產的畫琺瑯區分出三種類型：一、仿歐洲畫琺瑯的（圖8）；二、按宮廷樣式燒造的（圖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典型的廣東畫琺瑯（圖15）。[74] 又如陳夏生在《明清琺瑯器展覽圖錄》中，亦舉列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中廣東畫琺瑯之例（圖9、10），並結合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的相關內容來推敲其產地。

此外，《活計檔》陳設檔案、故宮點查報告重新刊行，再加上國家型數位計畫支持下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之整理與拍攝，使廣法瑯的區辨工作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本章節即想利用這些新的材料之交叉比對，重新區辨整理出清宮舊藏「廣琺瑯」，釐清清宮「廣琺瑯」的特色。一方面擴充我們對廣東地區銅胎畫琺瑯面貌的理解；另一方面，透過分類、解讀這些作品的風格特色，擴及其他公私立收藏中「廣法瑯」的辨識。並藉由對器底款識的深入分析，進一步深入探索「廣法瑯」與「清宮畫琺瑯」之關係。

首先我們來看一段《活計檔》之紀錄，乾隆四十年〈行文〉：「（十一月）十九日，員外郎四德、庫掌五德、福慶來說，太監胡世傑交金胎西洋法瑯碗一件隨楠木匣一件、銅胎西洋法瑯花籃一件隨楠木匣一件、銅胎西洋法瑯缽盂一件、銅胎西洋法瑯方滷銚一件，俱係康熙御製款。銅胎西洋法瑯杯盤一分係雍正年製款。銅胎畫法瑯仿成窯花樣蓋罐一對隨楠木匣、銅胎畫法瑯包袱式蓋罐一件隨楠木匣、銅胎畫法瑯壺一件隨楠木匣，俱係雍正年製。傳旨，將法瑯缽盂滷銚盃盤各配楠木匣盛裝，得時並法瑯壺碗花籃罐俱發往粵海關，交德魁照樣各成做一件，不要廣法瑯，務要洋法瑯，亦要細緻燒乾隆年製款，欽此。於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員外郎四德、五德，將粵海關監督德魁送到法瑯器十件，隨做樣法瑯器十件持進，交太監如意呈進，交乾清宮做樣法瑯器配匣，另有記載訖」。[75] 這段記載非常關鍵，因為它就是揭露那些過去被誤認為清宮造辦處製作「廣琺瑯」作品的真正產地，也是開啟本文針對粵海關成做「廣琺瑯」進行深入探討的重要材料。[76] 幸運的，文獻中提到的這些作品，大

---

[74] 楊伯達，〈從清宮舊藏十八世紀廣東貢品管窺廣東工藝的特點與地位—為《清代廣東貢品展覽》而作〉，頁21-22。

[75]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38，乾隆四十年十一月，〈行文〉，頁664-665。粵海關送進複製成品之記錄，見《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40，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記事錄〉，頁470。此次複製工作費時較長，整個過程約兩年完成。

[76] 另外一條也是發實物原樣到粵海關，成做後送回清宮的類似紀錄，可見《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45，乾隆四十七年，〈行文〉，頁404-40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多連同木匣完整保留在乾清宮的配殿中，隨著文物播遷，今日大多收藏在國立故宮博物院中。⑰ 從品名、木匣即相對位置，我們大致可對出具體的實物。篇幅所限，在此舉列其中幾組較為確定的實例作品來說明，文中提到作樣的「康熙御製」款「金胎西洋法瑯碗」，應該就是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清康熙金胎畫琺瑯黃地花卉碗〉（圖16A），而粵海關成做的相應成品即為〈清乾隆廣琺瑯黃地花卉碗〉（圖16B）；文中提到的「康熙御製」款「銅胎西洋法瑯方滷銚」，應該是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清康熙銅胎畫琺瑯黃地菊花方壺〉（圖17A），〈清乾隆銅胎廣琺瑯黃地菊花方壺〉可能就是照樣複製的成品（圖17B）；⑱ 文中提到的「雍正年製」款「銅胎畫琺瑯仿成窯花樣蓋罐一對」之複製成品，可能是〈清乾隆銅胎廣琺瑯仿鬥彩花蝶紋圓蓋罐一對〉（圖18）；而「雍正年製」款「銅胎畫琺瑯壺一件」之複製成品，可能是〈清乾隆銅胎廣琺瑯白地藍花執壺〉（圖19）。從上述的例子中，我們清楚知道廣東工匠不是照著宮中送來的樣，而是實物樣，進行模仿，其模仿之功力及技術相當驚人，因為除了器形及繪畫風格有細微的差別外，構圖細節及配色幾乎一模一樣。而這類帶「乾隆年製」宋體四字款仿康熙、雍正銅胎畫琺瑯的作品，在過去皆被視為是北京造辦處製作的，但從上述的檔案文獻資料，又根據這些作品所附之乾隆時期木匣上的題款「廣琺瑯」，故皆更正為粵海關成做的琺瑯作品。

這個例子除了修正前人對此批作品的判斷外，並展現了從檔案、清冊、木匣、款識到實物互相搭配之做法，可為「廣琺瑯」之區辨提供重要的基礎。然如同上例帶有清楚脈絡的「廣琺瑯」實物僅限於前述原保存於乾清宮配殿、現今絕大多數收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一批作品，然若要再進一步推求其他不在此批收藏中的「廣琺瑯」作品，則需要以此批作品為標準品，從風格和款識歸納出「廣琺瑯」之特色，交叉比對、相互印證來區辨。我們可考察這些作品的底款，並運用清宮中此類作品隨附木匣之「廣琺瑯」或「洋琺瑯」題款，歸納

⑰ 其中，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中並無康熙銅胎畫琺瑯花籃之作品，推測文獻中所言「銅胎西洋法瑯花籃一件」，實物原樣為收藏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康熙銅胎畫琺瑯黃地牡丹花籃〉。圖版參見李久芳，《金屬胎琺瑯器》（香港：商務書局，2001），圖125。

⑱ 該文獻所提作品之完整比對，請見拙稿，〈清宮畫琺瑯的廣東版本：粵海關成做「廣琺瑯」之風格篇〉，待刊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出「廣琺瑯」之書款樣式及風格與清宮內務府「清宮畫琺瑯」之間的差異，作為判讀「廣琺瑯」的重要依據，未來可進一步據此判別其他脈絡中的「廣琺瑯」。難能可貴的是，收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之琺瑯箱中之銅胎畫琺瑯收藏，木匣大多數保留完整，並且拜近年國家型數位典藏計畫之賜，皆有清楚的數位圖檔可供參考。乾隆皇帝下令「也要細緻燒製乾隆年製款」，[79] 此類作品之款識可見是模仿北京造辦處畫琺瑯仿宋體字或楷體字風格之典型雙方框四字款，但地方之書風及水平畢竟不如宮苑之內，器底的款識經常透露出許多破綻，使我們得以從作品外表風格之外，也能從所書的款識重新辨識出當時廣東製作畫琺瑯作品之面貌。在此脈絡下，款識亦作為判斷「廣琺瑯」的重要依據，因此在此有必要對此部分之研究方法與取徑，進行說明。

在《清代廣東貢品》一書中，楊伯達雖未明確說明他區辨廣東畫琺瑯的依據，但從作品都附帶公布款識圖片看來，作品款識或許是他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圖8），這同時也提示我們，作品的款識很可能帶有區辨「廣琺瑯」的訊息；陳夏生《明清琺瑯器展覽圖錄》的主要關懷雖不在區辨「廣琺瑯」，但作者也指出了多件廣東畫琺瑯作品，並首次明確指出由款識書寫方式，可以推定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清乾隆銅胎廣琺瑯西洋風景人物瓶〉（圖9）、〈清乾隆銅胎廣琺瑯人物蓋碗〉（圖10）皆為廣東琺瑯。[80] 這兩件作品，款識分別為「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篆款、楷款，掌握了這兩種款識樣式，即使不閱讀書中

---

[79] 對於乾隆朝檔案中「細緻燒」一詞的理解，或可直接解釋為「仔細小心」地製作，然由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之〈清 乾隆 黃釉雙獸耳罐〉（中瓷1543）上的款識看來，其雖使用了雍正朝的款識樣式，但筆畫較細，且乾隆十三年《活計檔》也記載乾隆皇帝下令要此器刻款時須「往細緻篆」（《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6，乾隆十三年三月，〈如意館〉，頁242）。而本文對合「也要細緻燒乾隆年款」的廣琺瑯，其線條也有著勻而細的特徵。則當時製作者對於所謂的「細緻」一詞，可能較注重「細」之偏義吧。

[80] 據書中所言，陳夏生此項推定，乃是「根據〈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3457號載」，個人曾就此請教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張麗端科長，張科長推敲這可能是原檔上的標籤的編號，筆者循此索尋，發現一號之內，範圍甚大，很難具指陳夏生所引之原句，故述其原委於此，也向張科長表示謝意。文見陳夏生，《明清琺瑯器展覽圖錄》，頁40、253。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說明，我們可以也很快辨識出該書所舉列的其他作品亦為廣東作品，[81] 此例也加強了我們進一步以款識區辨「廣琺瑯」的信心。而前述2008年廖寶秀對同樣與清宮畫琺瑯有淵源的景德鎮御窯廠「洋彩」研究中，亦在風格之外，將前人依款識的做法及風格來區分清宮的「磁胎畫琺瑯」（其款識多為「乾隆年製」藍料釉上仿宋款），以及景德鎮的「洋彩」（多為釉下青花篆款）加以確證及修正；另有「乾隆年製」藍料釉上四字篆款一類，經常被誤認為是清宮的琺瑯彩瓷，但其實應該是景德鎮所製的「洋彩」。[82] 換句話說，款識的使用，宮中、地方顯然有所差別，此研究，或也預示了以款識字樣分別廣東與宮中所生產銅胎畫琺瑯的可能。

另一方面，前舉製作於乾隆朝、隨附於銅胎畫琺瑯實物的木匣，則帶來了更進一步的證據，區辨「廣琺瑯」（包括「洋琺瑯」）實物的可能性，這是因為木匣上的刻款，等於是乾隆內廷對這些銅胎畫琺瑯性質與製作地點的判定，正以其距離作品成做的時點尚近，判斷較為可信，透過木匣上的款銘，我們就能掌握一群北京製作與廣東製作的銅胎畫琺瑯標準品，並以此為基礎，結合對於器上款識的判讀，尋找其共性，索尋出更多的「廣琺瑯」樣本。觀察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的〈清乾隆銅胎畫琺瑯四季花盤〉（圖20）、〈清乾隆銅胎畫琺瑯帶耳罐〉（圖21）等作品，這些作品均隨附木匣，木匣上款銘也支持其應為內廷製作之銅胎畫琺瑯（參見「附表三：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清代乾隆朝銅胎畫琺瑯隨附木匣知見表」故琺104、故琺443）。而其款識一如廖寶秀所指稱成做於清宮的「磁胎畫琺瑯」，皆是間架亭勻、橫畫細、豎畫粗的標準宋體字款，更值得注意的是，後者繪飾有近景西洋人物，就個人所掌握的乾隆朝銅胎畫琺瑯看來，凡作西洋人物作近景處理者，幾乎都作標準宋體字款識；反之，將器上繪飾的西洋人物作遠景處理者，則未見標準宋體字款識，可見風格與款識之間，也有著互相牽連的脈絡可尋。

接著，藉由「木匣」款銘的指稱，我們可以進一步考察、解讀「廣琺瑯」的款識狀況。首先，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裝盛一件執壺的木匣外壁，恰見「乾

[81] 例如該書中第266頁的〈清乾隆畫琺瑯團花蓋罐〉與第253頁的〈清乾隆畫琺瑯瓜楞式手爐〉。

[82] 廖寶秀，〈乾隆磁胎洋彩綜述〉，頁3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隆年製廣琺瑯壺一件」款銘（圖19），說明了這件作品的來源，器底款識的書寫品質雖遠遠不及前舉〈清乾隆銅胎琺瑯四季花盤〉（圖20），但是其刻意整齊規矩的用筆，以及款外框圍兩圈內細外粗的樣式，顯示其款識取徑的對象。同樣的狀況也見於裝盛木匣刻有「乾隆年製銅胎廣琺瑯圓蓋罐壺一對」款銘的〈清乾隆銅胎廣琺瑯仿鬥彩花蝶紋圓蓋罐〉（圖18），只是此件的款識筆劃更細。而伴隨木匣亦標明其為「廣琺瑯」的〈清乾隆銅胎廣琺瑯包袱式罐〉（圖22），亦然可見其模仿如〈清乾隆銅胎琺瑯四季花盤〉（圖20）般的宋體字效果。換句話說，這一群可以作為標準品的廣琺瑯，顯示了程度不一仿模「清宮畫琺瑯」書寫宋體字的狀況，但是，他們顯然沒有寫出像如〈清乾隆銅胎琺瑯四季花盤〉（圖20）款識那樣筆劃平直、交角銳利的「宋體字」，或許這就是「廣琺瑯」款識的重要特色。

有了以上的認知，至少可以謹慎地歸納上述「廣琺瑯」的款識特色，特別是那些與標準宋體字有所差異的部分。換句話說，這些「廣琺瑯」款識既然以宋體字款識的效果為模仿對象，其間或許有共同的認知，從而影響了款識的字樣、風格。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超越以單品款識風格對合單品的作法，直接以這一群「廣琺瑯」標準品的共性，來索尋其他「廣琺瑯」的蹤跡。例如這群標準品款識（圖18、19）用筆較輕而相對表現出稍多的用筆趣味，結字也稍稍顯現向外張的寬綽感，特別是「年」字第四筆短豎，略向右下寫去，與〈清乾隆銅胎畫琺瑯四季花盤〉（圖20）上「年」字短豎垂直以及其所造成的幾何空間分割有所差異，這是漢字書寫由下而上、欲左先右的書寫動勢所造成，換句話說，較之短豎直下所造成的幾何感、設計感，其略向右下寫去的短豎，實透出了較多的人為書寫性。此外，〈清乾隆銅胎廣琺瑯仿鬥彩花蝶紋圓蓋罐〉（圖18）、〈清乾隆銅胎廣琺瑯包袱式罐〉（圖22）款識中「隆」字「夂」部的書寫也值得注意，因於書法書寫的連續動勢，其最後兩筆的映帶動勢軌跡，往往相當類似於「α」。書法家書寫「隆」字「夂」部捺收時，受到手腕的限制與捺劃筆勢，常常將向下的動勢略略調整向右而衍出。相對的，較不熟練的書寫者，比較不會去注意、約束末筆向下的動勢，所以會造成如這兩件作品款識「隆」字中「夂」部夾角較小而末筆動勢較為向下的情況。但〈清乾隆銅胎畫琺瑯四季花盤〉（圖20）的款識雖是宋體字，但已經吸收了這項較好的書家書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寫規範，所以其「攵」部夾角較大而末筆動勢有較強的右向性。而這些差異性，正指向了區辨「廣琺瑯」款識的途徑。[83] 同時，也更清楚地看到「廣琺瑯」款識對於「清宮畫琺瑯」款識的模仿。

另一方面，這些被辨認出來的「廣琺瑯」，也可以反饋由字樣區辨「廣琺瑯」的可信度，例如〈清乾隆銅胎廣琺瑯花卉渣斗〉（圖23），以及〈清乾隆銅胎廣琺瑯西洋人物瓶〉（圖24B）兩件，其款識中「年」字第三筆橫畫較長，而第五筆橫畫較短，字樣顯然與其他有所差別，而且也與一般書寫「年」字樣式不同。對此，我們可以取國立故宮博物院一對〈清乾隆金胎廣琺瑯花籃〉（圖25），其伴隨的木匣上正有：「乾隆年製金胎廣琺瑯花籃一對」楷字款銘，且「年」字的字樣特徵，亦與上引之兩件相同。於是，我們就更有信心指出如〈清乾隆金胎廣琺瑯番蓮碗〉（圖26）一類的作品，同樣也來自廣東。這種獨特字樣的存在，可能意味著「廣琺瑯」款識除了學習宮廷而略失故步的一類作品外，已經有了獨特字樣的傳播，而且這幾件多半結字均勻、線條趨向挺直，〈清乾隆內填琺瑯番蓮紋五供一組〉也有著類同的字樣，[84] 且均勻挺直的特色更為加強，已被陳夏生指為「宋體字款」，可說是廣東自行發展出來的「宋體字」款識了。

附帶一提的是，木匣上的題銘刻款，除了「廣琺瑯」標誌出粵海關所製者外，還有「洋琺瑯」刻款的作品，如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之〈清乾隆銅胎廣琺瑯方壺〉（圖27），其伴隨木匣上便刻有「乾隆年製銅胎洋琺瑯滷壺一對」，由其底款及畫琺瑯風格，我們可確知其亦屬粵海關所成做。同樣的情形，在其他隨附木匣上刻有「洋琺瑯」的作品中，也可見（參見附表二）。這些「洋琺瑯」的年號款識風格，應可歸於「廣琺瑯」的範圍中。再者，就中之〈清乾隆銅胎洋琺瑯小圓盒〉（圖28A），若與國立故宮博物院另一對帶有「廣琺瑯」銘款木匣的〈清乾隆銅胎廣琺瑯小圓盒〉（圖28B）相對，兩者雖一屬「洋琺瑯」而一屬「廣琺瑯」，但無論是風格或是款識，皆難辨彼此，這也加強了由款識將兩者劃為同一類作品的觀察。

---

[83] 據此可推論，以往在《明清琺瑯器展覽圖錄》一書未被納入「廣琺瑯」群的作品，如書中第242、244、245、246、260、261、262頁等件，據此都可以被歸為廣東製作。

[84] 圖版參見陳夏生，《明清琺瑯器展覽圖錄》，頁276。

臺灣大學圖書館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根據以上的考察，我們就可以嘗試更明確地區辨、範限出乾隆朝廣琺瑯實物，今即以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之銅胎畫琺瑯為標的，地毯式地索尋乾隆朝的廣琺瑯，經初步查找，在其所藏近千件清代銅胎畫琺瑯作品當中，約有三百多件為乾隆朝「廣琺瑯」，現製為「附表二：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清代乾隆朝『廣琺瑯』表」，此外，國立故宮博物院之乾隆朝銅胎畫琺瑯與木匣俱存者，則製為「附表三：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清代乾隆朝銅胎畫琺瑯隨附木匣知見表」，二表皆附於文後，或可供學界參考、使用。除此之外，款識也可以是一種解釋當時中央、地方互動的史料，從廖寶秀對「洋彩」與清宮瓷胎畫琺瑯的款識分類中，不只是區辨了兩地的產品，還顯示了宮廷與地方對款識看法的不同，亦即景德鎮「洋彩」有著承襲陶瓷製作的三行六字篆款傳統；而宮中瓷胎畫琺瑯則盡可能遵守雙行四字宋體字款的習慣。宮廷、地方有別，一方遵循具有書寫傳統的玉筋篆字，一方則將取用無書家在背後「版刻」傳統。同樣的道理，前述觀察廣琺瑯款識共性的過程，也說明了宮廷之以「宋體字」為款識，也許和瓷胎畫琺瑯有同樣的脈絡；相對於宮廷的傳統，廣東或許可以直接取用或恪守這個脈絡。但在此之前，廣東地區會遇到兩個難題，一是宋體字的書寫並不容易，書寫者要既要有意願理解、恪守書寫宋體字的規範，也要有相應的書寫能力；再者，還涉及對於宋體字的理解，這很像我們一代一代面對書法典範的處境。廣東地區，或說相對於宮廷的另外一個「體制」，他們「共性」呈現的是：只取用宋體字部分概念，亦即分佈平均、字體整齊而抑制書法表現性因子的宋體字。對於宋體字因於「版刻」傳統而呈現的無速度筆畫，以及版刻機械性與傳統書法精鍊後的結字，廣東地區既忽而略之，也沒有相應的書法能力來追隨，實有別於洋彩、瓷胎畫琺瑯的各執一端，呈現另種宮廷與地方互動的景況。

四、「廣琺瑯」風格特色

前一章節中，我們以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乾隆時期的銅胎畫琺瑯為對象，參照實物款識、木匣及清冊，將帶有乾隆年款「廣琺瑯」作品辨識出來（參見表二），並製表整理。接下來，我們將就此批作品之風格進行歸納分析，希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由此進一步探求「廣琺瑯」的風格特色，釐清乾隆時期清宮「廣琺瑯」的面貌，作為未來深入研究之基礎。此批清宮「廣琺瑯」作品約有數百件之多，器形、裝飾技法與紋飾也呈現多樣的面貌。除了受命成做與清宮中幾乎一模一樣、難以區辨的作品外，亦有以此為基礎加以延伸發展的風格，或是跟廣東外銷琺瑯相通、帶西洋風景人物母題之作品等。

由前文以相關文獻、清宮木匣及款識區辨「廣琺瑯」的討論，我們已能較確實掌握「廣琺瑯」實物群的範圍，以下從目前清宮舊藏的實物中，由款識形式及寫法來分群、分析，其略可分成兩大類：一類是仿「清宮畫琺瑯」四字「乾隆年製」宋體字款的作品，另一類是帶有「大清乾隆年製」六字楷款或篆款之作品。

（一）書有「乾隆年製」四字款之作品

首先我們要來看帶有「乾隆年製」四字款的作品，將此類作品辨識出來的工作相當重要，因為如前所述，它們在過去幾乎都被當成是在北京造辦處琺瑯作坊中上彩燒製的「清宮畫琺瑯」，而被錯置到清宮的脈絡中。在此，本文希望將它們放到廣東粵海關的脈絡中，重新來理解。

前述逼真模仿康熙、雍正時期清宮銅胎畫琺瑯作品的作例（圖16-19），無疑百分百吻合清宮規制；類似脈絡下模仿康熙時期出現的「皮球花」紋樣圓盒（圖28A、28B）外，廣東地區則還出現了同樣紋樣風格但加上鳳首流的提梁壺及觚式瓶。[85] 另外仿雍正時新開發的包袱罐亦令人印象深刻，現今留存同類作品數量不少，或是屬於上述文獻中提到發實物樣於廣東仿製的「銅胎畫法瑯包袱式蓋罐」一類之作品（圖22）。這些與原樣真實的仿作，也是乾隆朝除了為康熙以來發展的清宮畫琺瑯整理、配匣、定名之外，並真實仿作前朝作品以證實其在技術與風格上的成熟掌握。

另有一類作品，則是在這些宮廷樣式上再進行變化。例如許多色地花卉作

[85] 有關「皮球花」紋飾在清宮中的運用，本文參見了易穎梅，〈「皮球花」紋起源：以故宮所藏康雍乾三朝器物為中心〉，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東亞與歐洲工藝美術交流〉課程2010年1月學期報告。

臺灣藝術期刊資料庫

品及錦地開光作品，亦書有「乾隆年製」四字款，有類似「清宮畫琺瑯」皇家典型的黃地花卉作品（圖29），但相較於清宮銅胎畫琺瑯，纏枝花紋十分細碎、滿布器表，構成一種熱鬧的氣氛。而有一些作品，雖仍可看出依循宮廷樣式，但是風格有些差距，款識寫法也較為粗糙，或許燒製年代較晚也說不定，有待未來進一步研究。例如楊伯達所舉的乾隆款黃地花卉鼻煙壺（圖7），又如另一對模仿雍正〈銅胎廣琺瑯仿成窯花樣蓋罐〉（圖30），與前述同類蓋罐在風格上大異其趣，線性用筆消失，採用色塊暈染的西洋畫法，色彩鮮豔，有光影明暗變化。

有一類模仿其他材質的作品。以畫琺瑯作法模仿掐絲或內填琺瑯，用金彩描繪出像是掐絲或塹刻之輪廓線（圖23）。[86] 廣東有一些仿古銅器作品，仿古銅器或仿其他材質作品（圖31），通常不僅器形，連古銅器表面銅銹色調也一起逼真地模仿。這樣的例子在康熙時期清宮的銅胎畫琺瑯作品中即可見到，[87] 但作例極少，在乾隆時期的廣東畫琺瑯中數量增多，可能與乾隆時期的仿古風潮有關，值得未來進一步注意。有趣的是，在清代琺瑯料的開發運用下，不論景德鎮的瓷胎或廣東的銅胎畫琺瑯作品皆可以模仿其他各式材質之擬真肌理表現，但是相較之下，瓷胎可能更勝一籌之處，在於瓷胎表面可做立體處理（例如以雕刻的形式模仿雕漆），景德鎮「洋彩」中就可見到仿漆器、木器的作品；而銅胎相對僅能做平面的模仿。[88]「廣琺瑯」中有一些與像生或與寫生有關的作品，例如荷葉式盒（圖32）、桃式盒，以及一對描繪寫生昆蟲的大罐（圖33）。這些作品在過去亦都被當成是清宮製作的畫琺瑯，經由款識的比對後，我們認為它們應該都是廣東受命接樣製作後送進宮中的作品。

帶「乾隆年製」四字款的作品中，也有少數幾件以西洋風景人物為裝飾主題的作品（圖24、34）。「廣琺瑯」中，裝飾西洋風景人物之大瓶、大罐，大多是帶有「大清乾隆年製」六字款的（圖8-9）。上開舉列帶「乾隆年製」四字

---

[86] 楊伯達，〈從清宮舊藏十八世紀廣東貢品管窺廣東工藝的特點與地位〉，頁10-38。張麗，〈描金畫琺瑯芻議〉，《故宮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4期，頁25-32。

[87] 圖見李久芳主編，《金屬胎畫琺瑯》，圖176。

[88] 瓷器仿雕漆圖版可見石守謙、馮明珠主編，《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2），圖V-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款的兩件作品（圖24、34），西洋人物一男一女的搭配方式，以及衣著風格，似與乾隆時期清宮〈職貢圖〉製作時所使用的稿本似乎存在有一定的連繫。[89] 不過，在目前所見北京造辦處製作的清宮畫琺瑯中，尚未見到這一類的圖像，反倒在外銷廣東琺瑯或玻璃畫中，較常見到類似形式的西洋人物圖繪（圖35）、（圖36）；箇中原由，還有待將來進一步深究。

檔案中曾要求粵海關按清宮發樣成做西洋琺瑯瓶、罐，要「乾隆年製」款，且要「自配花紋」，是否與上述這類作品有關也說不定。乾隆二十二年的《活計檔》提到：「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來說，太監胡世傑傳旨，著畫瓶、罐等紙樣呈覽，准時發往粵海關燒造西洋法瑯的，要乾隆年款，欽此。於二十三年二月七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將畫得瓶、罐紙樣大、小四十張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准得瓶、罐紙（樣）二十九張着粵海關按樣自配花紋做西洋法瑯的，要乾隆年製款，隨貢陸續呈進，俟有傳旨不必燒造時，再行停止燒造，欽此」，[90] 指的可能就是這類作品。此批作品做成後送進北京造辦處，配做紫檀木座及楠木匣後，於乾隆二十四年二月持進陳設在養心殿，後來奉旨送往圓明園交總管李裕在水法殿擺放。[91]

帶有四字「乾隆年製」宋體字款之作品，與清宮畫琺瑯之風格特點較為接近，多為直接模仿或些許變化（例如圖5、16-19、27-28），而其他作品雖主要依據清宮發來之樣稿製作，然相較清宮畫琺瑯典雅莊重之風格，「廣琺瑯」色地花卉作品之繪製細節，顯得更為繁複、細碎（圖29），此感覺主要來自輪廓線的運用，黑色的輪廓線十分突顯；在描繪形體時，不但線條細且筆畫相對多。這樣的特點，在後來各式變化器形或裝飾花紋的大量生產作品中更加明顯（例如圖24），又如各式盒類作品（圖37）等；這些作品品質似乎較不講究，

---

[89] 當中部分西洋人物之形象（尤其是廣東外銷法瑯）與乾隆時期傳謝遂繪〈職貢圖〉或嘉慶年間內府刊本〈皇清職貢圖〉圖版參見林莉娜，〈清朝皇帝與西洋傳教士〉，《故宮文物月刊》，236期（2002），圖二二。賴毓芝在討論清宮〈職貢圖〉亦提及其與畫琺瑯使用圖像之可能關連。賴毓芝，〈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5期（2012），頁35-36（1-76）。

[90]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22，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行文〉，頁742。

[91]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23，乾隆二十四年二月，〈匣裱作〉，頁798-79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彩繪筆法較為粗糙，配色亦較俗艷，與清宮較雅緻的色彩搭配不盡相同，更接近後來為泰國或印度製作的外銷琺瑯。同時，另有一類作品，則是放棄線條，採用西洋色塊暈染畫法、注重明暗對比（圖30）。[92] 這些或許也可視為時代較晚或是更具地方特色的作品。

（二）書有「大清乾隆年製」六字款之作品

帶有「大清乾隆年製」六字款之作品一般是大瓶、大罐類的器形，裝飾形式大多為錦地開光，開光中置入西洋風景人物或中式庭園人物畫。基本上可能是在清宮畫琺瑯錦地或色地百花搭配開光琺瑯畫風格的基礎上，加以延續發揮。西洋風景人物主題是此類作品最主要的特色，但與乾隆時期清宮畫琺瑯裝飾西洋風景人物做法最大的不同處（圖2、21）在於，「廣琺瑯」構圖中人物所佔的比例普遍較小，風景山水佔據較大的畫面。相較於「清宮畫琺瑯」開光中西洋風景人物多為近景人物，且內容以母子圖為大宗，少數可追溯到特定之神話或宗教故事，據屈志仁的考證，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清乾隆銅胎畫琺瑯小西洋人物觀音瓶〉（圖2）之西洋風景人物與義大利版畫中的宗教故事有關；[93] 又如日本永青文庫藏瓷胎畫琺瑯雙連罐上的海神與巴利斯審判的故事。「廣琺瑯」則多為遠景人物，人物比例小，風景比例相對大，且細節更多，布局安排以一對男女或人群的形式最多，大多無特定之故事內容。除了大多數開光內裝飾西洋風景人物，有一部分為中式庭園人物（圖10）。

由此或可推知，清宮與廣東可能使用不同的圖式稿本，而對西洋風景人物畫的處理手法可能也存在有差異。然更有趣的是，此類西洋風景人物作品，在帶有四字款或六字款的作品中，似乎也使用有共通的圖式稿本（例如圖8、9、24、34）；並且與廣東外銷藝術得以連結，顯示彼此之間可能有共同流通的稿本（圖35-36），這樣的現象也支持我們前面強調，儘管粵海關大多時候按照宮廷發樣來成做，造辦處琺瑯匠人也多數來自廣東，地方手工業原有之因

[92] 相關圖版可參見 Michael Gillingham, *Chinese Painted enamel*, pl. 129, pl. 130.

[93] James Watt, “The Antique-Elegant,” *Possessing the Past: tr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6), pp. 518-519.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素亦不能完全忽略；畢竟其製作的環境與條件，與清宮造辦處的琺瑯作坊有所差異。㊹

此外，在錦地或色地花卉（百花）的表現，呈現較清宮畫琺瑯更為繁複的效果，如同前面分析「廣琺瑯」之繪製特點，我們可以觀察到，這個效果來自更明顯的輪廓線，且在綠色的葉片上更有相對細碎密集的線條（例如圖16A、B之對照；圖17A與B之對照；圖1與29之對照）。另外，我們還可舉蕉葉紋為例，兩件〈清乾隆銅胎廣琺瑯西洋人物瓶〉（圖24）葉脈的線條同樣更為細碎。

「大清乾隆年製」楷體或篆字方框六字款之形式與寫法，相對於前述「乾隆年製」四字宋體字款，更接近景德鎮御窯廠生產慣用瓷器之款識。帶「大清乾隆年製」六字楷款或篆款者，或可對照「洋彩」中也有「大清乾隆年製」六字釉上紅料、金彩或釉下青花款。這樣相似的現象，會不會是追隨景德鎮官窯的模式、帶「大清乾隆年製」六字楷款或篆款而來？㊺ 但整體來說，六字款的作品相對表現出較多的地方特色，例如具有洛可可裝飾風的西洋風景人物大罐（圖8-9）；或如繪有中式庭園人物的作品（圖10）。

清宮的銅胎畫琺瑯造作逐漸從清宮轉到地方，乾隆朝粵海關負擔了成做琺瑯的重要任務。自乾隆十三年開始下令廣東粵海關燒進銅胎畫琺瑯作品之後，最晚到乾隆六十二年的紀錄中都還有相關紀錄，例如前述造辦處將乾清宮陳設洋漆格鐘一架燙樣發到粵海關成做「黃地五彩琺瑯表盤」。㊻ 嘉慶時期幾乎已經不見清宮樣式的「廣琺瑯」實例，國立故宮博物院僅有極少作例，〈銅胎廣琺瑯藍地包袱小瓶（圖38）主體紋飾為藍地纏枝花卉錦地，搭配先前發展而來的包袱巾裝飾，口沿飾花卉邊飾一圈、頸部及足沿飾蕉葉紋一周，製作細節不

㊹ 從目前的材料來看，我們無法確定粵海關官署內，是否設有專門生產畫琺瑯的作坊；或者更有可能的情況是，粵海關在奉命時，再選擇當地較佳的琺瑯作坊來成做交辦的活計。

㊺ 《活計檔》乾隆二十一年，〈行文〉:「十二月十一日，太監胡世傑傳旨:着貼款樣呈覽，准時發與李永標，嗣後凡進琺瑯瓶罐等俱各落款。欽此。於本月十二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將寫得大清乾隆年製篆款字長方並橫款紙樣一張持進，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 照樣准做發往。欽此。於十二月十五日發往粵海行文知會訖」《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21，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行文〉，頁770。

㊻ 引文參見本文頁1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若乾隆時期作品講究；北京故宮也曾發表一件嘉慶時期的作品〈銅胎畫琺瑯黃地牡丹文執壺〉，從款識來看，應該也是廣東製作，雖然整體品質與清盛世作品相較不可同日而語，然承繼皇家富麗的黃地花卉風格，加上流線造型的俏皮流嘴及把手。[97]

從上述的風格分析中，我們看到粵海關成做「廣琺瑯」不負所望，不論是複製作品的成做，或是仿古青銅器的迫人真實感，都難不倒它，充滿了活潑的生命力。帶「乾隆年製」四字款之作品，與清宮畫琺瑯之宮廷樣式較為接近；而帶有「大清乾隆年製」六字款的作品，則有較自由的表現，具有更多地方特色或與外銷琺瑯共通的母題及風格。

五、廣東進貢特色作品與廣東外銷琺瑯

「廣琺瑯」之外，廣東也製作具有地方特色的銅胎琺瑯作品呈進，清宮的舊藏中還有一批廣東製作的琺瑯，這類作品器底一般無款，風格通常是廣東特有的品類，例如透明琺瑯貼金銀箔及纍絲燒藍作品等，這類作品應該是地方自行燒製，作為地方特色貢品進入清宮。

透明琺瑯貼金銀箔，屬於內填琺瑯類別（金屬胎鏨刻後，再上琺瑯料燒製）之一種。透明琺瑯貼金銀箔作品的基本款，是指金屬胎錘鏨隱起或鏨刻後，貼上金銀箔花樣，再上一層無色的透明琺瑯，較複雜的類型也有在金屬胎鏨刻後先貼上銀箔紋飾，於其上施透明琺瑯，之後貼金銀箔花樣。[98] 前述粵海關為清宮成做的「廣琺瑯」中，有一類是金屬胎鏨刻後上透明釉的內填琺瑯做法（圖25-26）；然不論是金屬胎塹刻後上透明釉的內填琺瑯做法，還是再加

---

[97] 圖版見李久芳主編，《金屬胎琺瑯器》，圖242。

[98] 楊伯達，《清代廣東貢品》，頁55。清宮舊藏此類作品多為瓶、盆類作品，收藏在歐美博物館中的多為茶碗與托盤配套之作品。例如瑞士的Pierre Uldry Collection (Brinker and Lutz, *Chinese Cloisonné: The Pierre Uldry Collection* (New York: Asia Society Galleries in association with Bamboo Publishing, London, 1989), no.376), 英國的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 (Harry Mason Garner, *Chinese and Japanese Cloisonné Enamels* (London: Faber & Faber, 1962), no.82)，以及美國的中國陶瓷公司 (*Chinese Painted Enamels of the 18th Century*, no.20) 都有配套的茶碗與托盤。

臺灣人文藝術期刊資料庫

上貼金銀箔的裝飾（圖39），在清宮造辦處似乎並未見有發展，被認為是廣東特色琺瑯，亮麗釉色加上金銀箔裝飾，充滿金碧輝煌的效果，清宮舊藏中正有一批這樣的無款作品，應為廣東製作後進貢至清宮。透明琺瑯貼金銀箔的裝飾技法來源，應該與西洋玻璃、琺瑯有密切關係，例如清宮所藏西洋銅胎透明琺瑯嵌飾畫琺瑯風景盒，[99] 其中之具體關係目前未見有相關研究。纍絲燒藍作品則是在纍絲金屬器上，在特定設計的紋飾位置，填上琺瑯色料燒製而成，雖然顏色不只一種，但最常填藍色料，因此也被稱為燒藍。[100]

上述的廣東特色作品類別，也經常出現在外銷歐美的廣東琺瑯之中，除此之外，作為「廣琺瑯」主流的西洋風景人物大瓶、大罐器形，在外銷的廣東琺瑯上較為少見。外銷琺瑯中，西洋風景人物主題大致可分為兩類：較多見的是前述與職貢圖中西洋人物或玻璃畫相通之作品，常見裝飾在碗盤類作品上（圖35），少數相似的西洋風景人物出現在大型琺瑯畫片或立體器皿上，這類作品的裝飾母題明顯與西洋宗教人物故事或希臘神話故事有關的作品（圖40），可能以當時流通的西洋銅版畫或裝飾有該類母題的西洋琺瑯實物做為稿本，進行描繪，描繪十分注重立體感及光影效果，連百花錦地亦有光影表現。而以百花錦地框圍開光西洋人物的做法，類同前述「清宮畫琺瑯」流行的錦地開光樣式，在「廣琺瑯」上也得到發揮（圖8、24），並影響了廣東民間工藝的製作，在外銷產品的廣東琺瑯及廣彩上，也經常可見（圖40）。但是也不排除有歐洲畫琺瑯的直接影響，畢竟其原始根源還是來自歐洲。[101] 然這些外銷廣東琺瑯作品就不見有前述宮廷規制之特徵（器內施湖藍釉、「乾隆年製」或「大清乾隆年製」底款），器內經常是白釉地或或粉紅釉地，而非湖藍釉。

外銷廣東琺瑯作品留存在海外之數量相當大，但至目前為止，雖有一些零星的介紹，但仍未見有系統性的研究，本文礙於篇幅，僅就與粵海關廣琺瑯相關的部分進行初步的連結，更完整的研究有待未來繼續努力。

---

[99] 作品圖版可參見拙著，《日月光華：清宮畫琺瑯》，圖170。

[100] 作品圖版可參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天工寶物：八千年歷史長河》（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6），頁120。

[101] 參見拙著，《日月光華：清宮畫琺瑯》，頁5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結論

結合國立故宮博物院實物、檔案、木匣、清冊等材料，經過仔細的交叉比對、反覆驗證後，以款識及歸納所得的風格特徵為基礎，讓我們充分掌握了粵海關成做「廣琺瑯」之面貌，辨識出大量過去誤認為造辦處在北京製作的「乾隆年製」四字款作品為粵海關成做的「廣琺瑯」（例如圖5、 16-19、22-29、31-34 等，另參見表二）。相信對未來區辨其他「廣琺瑯」作品具有一定的效力。同時，我們對粵海關成做「廣琺瑯」來龍去脈的分析，也對清宮畫琺瑯的完整面貌，以及清代宮廷與地方互動，有進一步的理解。

廣東地區在清代前期就有直接由西洋傳來的畫琺瑯製作傳統，當地的技術、原料及風格也陸陸續續輸入清宮。康熙晚期在清宮造辦處中引介了歐洲傳入以及廣東地方的畫琺瑯工藝，建立了康、雍、乾三朝傑出的畫琺瑯藝術製作後，乾隆時期開始逐漸將內務府造辦處銅胎畫琺瑯的製作委託給粵海關，隨之而來也將清宮畫琺瑯的技術與風格傳入廣東地區。除了十分接近的複製外，粵海關成做「廣琺瑯」所呈現「清宮畫琺瑯」宮廷樣式典型的特徵，就是成對、器內施淺藍色釉、強調金屬邊沿，器形以大瓶、大罐為主；裝飾結構以色地花卉（百花）開光為主流。雖在細節或表現上與「清宮畫琺瑯」不完全相同，但這幾類裝飾母題亦與清宮畫琺瑯相符，應該當是隨著清宮樣稿或實物成做，而進入廣東畫琺瑯作坊的裝飾資料庫中。而開光西洋風景人物顯然與清宮有不同的稿本來源（與一般外銷廣東琺瑯之風格相通），可能是受指示自配花紋或受清宮同類作品啟發而來。然不論是與「清宮畫琺瑯」幾乎一模一樣、難以區分的作品、還是受「清宮畫琺瑯」錦上添花裝飾圖樣、錦地/色地花卉（百花）搭配開光之風格，在粵海關成做的琺瑯作品有所延續發揮，呈現更為繁複的效果。此外，其他的作品則表現出廣東琺瑯之特色做法，例如器內施白釉或粉紅色釉之畫琺瑯作品，透明琺瑯貼金銀箔、纍絲燒藍等變化之作品，作為特色的貢品進入清宮。

雖然限於目前掌握的資料，我們對於粵海關實際成做琺瑯活計之地點，以及其在清宮中具體運用之面貌等面向，仍不十分清楚，但從粵海關銅胎琺瑯造辦的例子所看到的宮廷與地方互動現象，最重要的關鍵除了實物之外，就是清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代內務府造辦處造作的特殊運作模式。北京與廣東之間的往來互動，使得地方的原料、技術、人力得以為宮廷所用，而宮廷的品味、樣式亦得以傳佈到宮闈之外。前面我們提示了內務府外派、外任官員在此之間所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視，以及宮廷與地方之互動運作模式，被拔擢外派、外任到地方擔任重要關差的內務府包衣，一方面有能力貫徹皇帝交辦的任務，一方面也在地方發揮重要的影響力，將熟知的宮廷品味，有意或無意傳播到地方之相關作坊中。而不同的地方單位因主事者之不同，運作模式亦稍有差異，景德鎮御窯廠成做洋彩的相對主動性，就與粵海關成做廣琺瑯可以相對照，兩者也呈現不同的風格走向。而粵海關之特殊地理位置，十八世紀清帝國對外之重要窗口，又使得粵海關成做「廣琺瑯」之例，在文獻與實物材料之外，再添東西文化交流的豐富動態。希望本文由清宮相關檔案文獻梳理的清早期材料，可作為未來研究清早期廣東琺瑯產業之參考。由清宮舊藏檔案、清冊、木匣及實物作品之交叉比對，清楚分辨出「廣琺瑯」之款識與風格，可成為未來進一步理解粵海關成做「廣琺瑯」之堅實基礎。而從宮廷與地方角度之分析，亦可為未來研究乾隆朝造辦處其他委外成做運作模式（例如蘇州織造、揚州鹽政）之參照材料。

【後記】本文截稿後，王竹平發表了〈康熙款與乾隆款浮雕琺瑯金碗的製作及其關聯性〉一文（《故宮學術季刊》，第30卷第4期（2013），頁155-206），提出粵海關燒製內填琺瑯送進清宮，以及少數受命委外洋製作之特殊案例。該文之內容可為本文所論述清宮與粵海關的鏈結，帶來相當具體的支持例證，然基於時間限制，未能將其研究成果放入本文的討論當中，特此註記，希冀未來有機會另撰文時，再將該文研究成果納入討論。

（責任編輯：陳卉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表一：造辦處琺瑯作（/處）廣東工匠生平略記

康熙朝

姓名	生平略記
潘淳（錞）	康熙55年9月，由廣東巡撫楊琳薦進宮中服務。（康摺7：442）
黃瑞興	康熙55年9月，由廣東巡撫楊琳薦進宮中服務。（康摺7：442）
阮嘉猷	康熙55年9月，由廣東巡撫楊琳薦進宮中服務。（康摺7：442）
楊士（世）章	康熙55年9月，由廣東巡撫楊琳薦進宮中服務。（康摺7：451-452） 雍正2年7月，原安家銀為每年一百二十兩，現裁減為八十兩。（雍摺3：299）
龍洪健	康熙55年9月，由廣東巡撫楊琳薦進宮中服務，並隨帶琺瑯料進京，其人為廣州監生。（康摺8：236） 雍正2年7月，告假回籍養親。（雍摺3：299）
林朝鍇（楷）	康熙55年9月，由廣東巡撫楊琳薦進宮中服務。（康摺8：236） 雍正2年7月，原安家銀為每年一百二十兩，現裁減為一百兩。（雍摺3：299） 雍正6年7月，病重將回故鄉廣東。（匯3：99，423） 雍正6年8月，因其回鄉，故安家銀將停發。（匯3：118-119，425-426）
何嘉璋	康熙55年9月，由廣東巡撫楊琳薦進宮中服務。（康摺8：236）

*另〈兩廣總督楊琳奏摺：英國等船來粵並護送本地畫匠進京〉，康熙五十六年八月二十日，「今有本地畫匠二人，試其所畫，雖屬平常，但二人情願進京效力，可同潘錞、楊士章一處工役學習，是以奴才遣人伴送來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明清宮藏中西商貿檔案》（北京：檔案出版社，2010），冊1，頁168-169；此文獻首見王竹平，〈金紅彩料在康雍時期琺瑯彩瓷的使用情形〉，頁299）。此處所言「本地畫匠二人」並未具名，或可能為〈兩廣總督孔毓珣奏承養內廷效力工匠家屬摺〉〈附件：在京匠人安佳銀兩清單〉中所列減銀廣匠十人中之兩人（雍摺3：299）。又此附件中之減銀廣匠十人中，除在康熙朝文獻中已出現的楊世章、林朝鍇兩人外，其餘八人併入雍正朝表中。但不代表此八人皆遲至雍正朝才入京，而是依據其姓名在檔案首次出現的時間而併入雍正朝表單中。

雍正朝

姓名	生平略記
楊起勝	雍正2年7月，原安家銀為每年一百二十兩，現裁減為一百兩。（雍摺3：299） 乾隆7年10月，食銀原為每月八兩，現增為每月十兩。（匯11：158-159） 乾隆14年11月，每月賞錢改減為五兩。（匯17：202）
黃元茂	雍正2年7月，原安家銀為每年一百二十兩，現裁減為八十兩。（雍摺3：299）
陳德	雍正2年7月，原安家銀為每年一百四十兩，現裁減為八十兩。（雍摺3：299）
胡璋	雍正2年7月，原安家銀為每年一百四十兩，現裁減為八十兩。（雍摺3：299）

臺灣藝術期刊資料庫

徐尚英	雍正2年7月，原安家銀為每年一百四十兩，現裁減為六十兩。(雍摺3：299)
張明德	雍正2年7月，原安家銀為每年八十兩，現裁減為六十兩。(雍摺3：299)
張瓊揆	雍正2年7月，原安家銀為每年八十兩，現裁減為六十兩。(雍摺3：299)
鄺麗南	雍正2年7月，原安家銀為每年八十兩，現裁減為六十兩。(雍摺3：299) 雍正5年11月，欲告假六個月回鄉省親、定親。(匯2：565-567)
張琦（琪）	雍正3年2月，原安家銀為每年一百二十兩，現裁減為一百兩。(匯1：677) 雍正5年11月，欲告假六個月回鄉省親，並攜家眷來北京。(匯2：565-567)
譚榮	雍正6年7月，宮中分派西華門外官房供其居住。(匯3：102，424) 雍正8年3月，畫飛鳴食宿雁鼻煙壺，受雍正皇帝賞銀二十兩。(匯4：531-532)

乾隆朝

姓名	生平略記
黃琛	乾隆6年11月，此際食銀為每月八兩。(匯10：312) 乾隆7年10月，食銀原為每月八兩，現增為每月十兩。(匯11：158-159) 乾隆14年11月，每月賞錢改減為六兩。(匯17：202)
黃念	乾隆37年12月，進啟祥宮行走，月給五兩。(匯35：559-560)
梁紹文	乾隆6年11月，此際食銀為每月八兩，安家銀為每年一百兩。(匯10：312) 乾隆7年10月，原安家銀為每年一百兩，現裁減為九十兩。(匯11：158-159)
倫斯立	乾隆6年11月，此際食銀為每月六兩，安家銀為每年一百兩。(匯10：312) 乾隆7年10月，原安家銀為每年一百兩，現裁減九十兩。(匯11：158-159)
胡思明	乾隆6年11月，此際食銀為每月六兩，安家銀為每年一百兩。(匯10：312) 乾隆7年10月，原安家銀為每年一百兩，現裁減九十兩。(匯11：158-159) 乾隆19年12月，此際已病故。原於乾隆16年7月告假回鄉。(匯20：528-529)
羅福昅	乾隆6年11月，此際食銀為每月六兩，安家銀為每年一百兩。(匯10：312) 乾隆7年10月，原安家銀為每年一百兩，現裁減九十兩。(匯11：158-159) 乾隆19年12月，告假回鄉期滿，由粵海關監督李永標送回北京，每月食銀五兩。(匯20：528-529)
梁觀	乾隆6年11月，此際食銀為每月六兩，安家銀為每年一百兩。(匯10：312) 乾隆19年12月，告假回鄉期滿，由粵海關監督李永標送回北京，每月食銀五兩。(匯20：528-529)
曾五連	乾隆14年4月，得諭令前往琺瑯處服務。(匯10：292)
唐金堂	乾隆14年4月，得諭令前往琺瑯處服務。(匯10：292)
李慧林	乾隆6年11月，以手藝稍次，月給為六兩。(匯10：312) 乾隆7年10月，原安家銀為每年一百兩，現裁減九十兩。(匯11：158-159) 乾隆13年4月，到畫院處幫助金崑畫《木蘭圖》、《蠶壇圖》。(匯16：205) 乾隆14年4月，得諭令前往琺瑯處服務。(匯10：292) 乾隆22年正月，請假一年，回家省親。(匯22：77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黨應時	乾隆6年11月，以手藝稍次，月給為六兩。（匯10：312） 乾隆13年4月，到畫院處幫助金崑畫《木蘭圖》、《蠶壇圖》。（匯16：205） 乾隆19年12月，告假回鄉期滿，由粵海關監督李永標送回北京，每月食銀五兩。（匯20：528-529）
胡禮運	乾隆6年11月，以手藝稍次，月給為六兩。（匯10：312） 乾隆19年12月，告假回鄉期滿，由粵海關監督李永標送回北京，每月食銀五兩。（匯20：528-529）
胡大友	乾隆14年11月每月賞錢改減為五兩。（匯17：202）
余熙章	乾隆13年4月，到畫院處幫助金崑畫《木蘭圖》、《蠶壇圖》。（匯16：205）
黃國茂	乾隆37年4月，造辦處以其手藝遲慢，欲另覓他人替換。（匯35：149-150） 乾隆37年12月，進琺瑯處行走，月給五兩。（匯35：559-560）
馮舉	乾隆37年12月，此際之月給為五兩。（匯35：559-560）

（匯.冊數：頁碼）表示《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之冊數頁碼。

（康摺.冊數：頁碼）表示《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之冊數頁碼。

（雍摺.冊數：頁碼）表示《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之冊數頁碼。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表二：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清代乾隆朝「廣琺瑯」作品列表

附註

1. 品名欄資訊，皆參酌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數位典藏資料庫（http://antiquities.npm.gov.tw/~textdb2/NPMv1/sindex.php）訂定。
2. 其他如無特別註明判定原因者，皆是筆者暫疑為「廣琺瑯」。

文物編號	千字文號	品名	款識
故琺3	呂-475-40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執壺罐〉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圈藍料楷款
故琺4	呂-475-6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團花提梁壺〉（洋琺瑯）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圈藍料楷款
故琺5	呂-475-6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團花提梁壺〉（洋琺瑯）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圈藍料楷款
故琺25	呂-475-25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白地藍花轉枝蓮圓盒〉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26	呂-475-25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白地藍花轉枝蓮圓盒〉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27	呂-475-35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白地藍花轉枝蓮圓盒〉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28	呂-475-35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白地藍花轉枝蓮圓盒〉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29	列-502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五彩人物觀音瓶〉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紅料楷款
故琺30	列-502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五彩人物觀音瓶〉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紅料楷款
故琺31	列-512-1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包袱式罐〉	「乾隆年製」雙交圈雙行四字楷款
故琺32	列-512-2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包袱式罐〉	「乾隆年製」雙交圈雙行四字楷款
故琺34	呂-488-32-1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獸面瓶〉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35	呂-488-32-2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獸面瓶〉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36	呂-475-66-1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花卉高足蓋杯〉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無框陰刻楷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故琺37	呂-475-66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花卉高足蓋杯〉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無框陰刻楷款
故琺38	列-298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雙耳蒜頭瓶〉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紅料楷款
故琺39	列-298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雙耳蒜頭瓶〉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紅料楷款
故琺40	呂-475-29-1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提梁卣〉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紅料楷款
故琺41	呂-475-29-2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提梁卣〉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紅料楷款
故琺42	列-500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提梁壺〉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圈藍料楷款
故琺43	列-500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提梁壺〉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圈藍料楷款
故琺76	列-286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帶戟方形瓶〉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藍料篆款
故琺77	列-286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帶戟方形瓶〉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藍料篆款
故琺79	列-399-15-1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爐〉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單方框紅料篆款
故琺101	列-634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蓋碗〉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102	列-523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牡丹方壺〉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紅料楷款
故琺103	列-523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牡丹方壺〉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紅料楷款
故琺105	列-624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小魚缸〉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106	列-508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包袱式蓋罐〉	「乾隆年製」雙交圈雙行四字楷款
故琺107	列-508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包袱式蓋罐〉	「乾隆年製」雙交圈雙行四字楷款
故琺117	列-427-5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番蓮碗〉（內填琺瑯）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118	列-427-5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番蓮碗〉（內填琺瑯）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120	列-375-10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番蓮碗〉（內填琺瑯）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121	列-375-10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番蓮碗〉（內填琺瑯）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故琺131	列-375-7-2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花籃〉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160	呂-475-22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石榴式瓶〉(洋琺瑯)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161	呂-475-22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石榴式瓶〉(洋琺瑯)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184	列-627	〈清 乾隆「敬製」款銅胎廣琺瑯番蓮紋蓋盒〉	「敬製」單行二字紅料楷款
故琺185	列-626	〈清 乾隆銅胎廣琺瑯黃地九壽杯〉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186	列-626	〈清 乾隆銅胎廣琺瑯黃地九壽盤〉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190	列-623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黃地牡丹花籃〉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紅料楷款
故琺222	午-15	〈清 乾隆銅胎廣琺瑯包袱式蓋罐〉	「乾隆年製」雙交圈雙行四字楷款
故琺223	午-15	〈清 乾隆銅胎廣琺瑯包袱式蓋罐〉	「乾隆年製」雙交圈雙行四字楷款
故琺225	列-304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滷銚〉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圈藍料楷款
故琺225	列-304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滷銚〉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圈藍料楷款
故琺227	列-528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海棠式盒〉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228	列-528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海棠式盒〉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233	藏-318-1-1	〈清 乾隆銅胎廣琺瑯瓜楞式手爐〉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單方框紅料篆款
故琺234	藏-318-1-2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黃地開光人物手爐〉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單方框紅料篆款
故琺235	藏-318-1-3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黃地開光人物手爐〉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單方框紅料篆款
故琺236	藏-318-1-4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黃地開光人物手爐〉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單方框紅料篆款
故琺237	呂-475-3	〈清 乾隆銅胎廣琺瑯帶耳三足洗〉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紅料楷款
故琺238	呂-475-3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出戟蓋罐〉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紅料楷款
故琺239	呂-475-14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花卉渣斗〉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紅料楷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故琺240	呂-475-14-2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花卉渣斗〉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紅料楷款
故琺253	列-427-14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碗〉（內填琺瑯）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254	列-427-14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碗〉（內填琺瑯）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280	列-375-9	〈清 乾款 銅胎廣琺瑯蓋杯〉（內填琺瑯）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281	列-375-9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蓋杯〉（內填琺瑯）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293	列-285	〈清乾隆銅胎廣琺瑯帶戟方花瓶〉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藍料篆款
故琺294	列-285	〈清乾隆銅胎廣琺瑯帶戟方花瓶〉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藍料篆款
故琺295	呂-475-37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海棠式盒〉（洋琺瑯）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296	呂-475-37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海棠式盒〉（洋琺瑯）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297	呂-475-34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包袱罐〉	「乾隆年製」雙交圈雙行四字楷款
故琺298	呂-475-20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小圓盒〉（洋琺瑯）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楷款
故琺299	呂-475-20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小圓盒〉（洋琺瑯）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楷款
故琺302	呂-475-73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提梁壺〉（洋琺瑯）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圈藍料楷款
故琺303	呂-475-73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提梁壺〉（洋琺瑯）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圈藍料楷款
故琺304	呂-475-58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方壺〉（洋琺瑯）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紅料楷款
故琺305	呂-475-58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方壺〉（洋琺瑯）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紅料楷款
故琺306	呂-475-50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石榴式瓶〉（洋琺瑯）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307	呂-475-50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石榴式瓶〉（洋琺瑯）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308	呂-475-59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石榴式瓶〉（洋琺瑯）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309	呂-475-59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石榴式瓶〉（洋琺瑯）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故琺311	呂-475-28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黃地西番蓮蓋鍾〉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312	呂-475-27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小圓盒〉(洋琺瑯)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楷款
故琺313	呂-475-27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小圓盒〉(洋琺瑯)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楷款
故琺323	呂-475-1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提梁卣〉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324	呂-475-1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三足洗〉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金彩楷款
故琺327	呂-475-65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鉢〉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328	呂-488-33	〈清 乾隆銅胎廣琺瑯海棠式蓋罐〉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329	呂-488-33	〈清 乾隆銅胎廣琺瑯海棠式蓋罐〉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343	列-527-2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海棠式盒〉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344	列-527-1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海棠式盒〉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345	呂-475-76-1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小盒〉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346	呂-475-76-2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小盒〉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347	呂-475-76-3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小盒〉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348	呂-475-76-4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小盒〉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349	呂-475-76-5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小盒〉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350	呂-475-76-6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小盒〉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351	呂-475-76-7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小盒〉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352	呂-475-76-8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小盒〉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353	呂-475-76-9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小盒〉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354	呂-475-76-10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小盒〉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故琺357	呂-475-38-1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海棠式盒〉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358	呂-475-38-2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海棠式盒〉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359	呂-475-55-1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折枝花圓盒〉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360	呂-475-55-2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折枝花圓盒〉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361	呂-475-57-3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海棠式盒〉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黑料楷款
故琺362	呂-475-57-4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海棠式盒〉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黑料楷款
故琺363	呂-475-57-1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菊瓣式盒〉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黑料楷款
故琺364	呂-475-57-2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菊瓣式盒〉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黑料楷款
故琺365	列-518-1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白地藍花圓盒〉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366	列-518-2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白地藍花圓盒〉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367	列-518-3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白地藍花圓盒〉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368	列-518-4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白地藍花圓盒〉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371	呂-475-4	〈清乾隆銅胎廣琺瑯白地藍花盤〉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372	呂-488-17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荷葉式盒〉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紅料楷款
故琺373	呂-488-9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方盒〉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單方框紅料篆款
故琺383	列-499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魚缸〉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414	藏-318-6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黃地彩花開光人物碗〉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單方框紅料篆款
故琺415	藏-318-6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黃地彩花開光人物碗〉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單方框紅料篆款
故琺416	藏-318-6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黃地彩花開光人物碗〉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單方框紅料篆款
故琺417	藏-318-6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黃地彩花開光人物碗〉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單方框紅料篆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故琺418	藏-318-6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黃地彩花開光人物碗〉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單方框紅料篆款
故琺419	藏-318-6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黃地彩花開光人物碗〉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單方框紅料篆款
故琺420	藏-318-6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黃地彩花開光人物碗〉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單方框紅料篆款
故琺421	藏-318-6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黃地彩花開光人物碗〉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單方框紅料篆款
故琺422	藏-318-6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黃地彩花開光人物碗〉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單方框紅料篆款
故琺423	藏-318-6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黃地彩花開光人物碗〉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單方框紅料篆款
故琺424	藏-318-6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黃地彩花開光人物碗〉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單方框紅料篆款
故琺425	藏-318-6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黃地彩花開光人物碗〉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單方框紅料篆款
故琺426	藏-318-6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黃地彩花開光人物碗〉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單方框紅料篆款
故琺427	藏-318-6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黃地彩花開光人物碗〉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單方框紅料篆款
故琺428	藏-318-6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黃地彩花開光人物碗〉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單方框紅料篆款
故琺429	藏-318-6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黃地彩花開光人物碗〉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單方框紅料篆款
故琺430	藏-318-9	〈清 乾隆銅胎廣琺瑯五彩人物盤〉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單方框紅料篆款
故琺431	藏-318-9	〈清 乾隆銅胎廣琺瑯五彩人物盤〉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單方框紅料篆款
故琺432	藏-318-9	〈清 乾隆銅胎廣琺瑯五彩人物盤〉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單方框紅料篆款
故琺433	藏-318-9	〈清 乾隆銅胎廣琺瑯五彩人物盤〉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單方框紅料篆款
故琺434	藏-318-9	〈清 乾隆銅胎廣琺瑯五彩人物盤〉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單方框紅料篆款
故琺435	藏-318-9	〈清 乾隆銅胎廣琺瑯五彩人物盤〉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單方框紅料篆款
故琺436	藏-318-9	〈清 乾隆銅胎廣琺瑯五彩人物盤〉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單方框紅料篆款
故琺437	藏-318-9	〈清 乾隆銅胎廣琺瑯五彩人物盤〉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單方框紅料篆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故琺438	藏-318-9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五彩人物盤〉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單方框紅料篆款
故琺439	藏-318-9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五彩人物盤〉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單方框紅料篆款
故琺440	藏-318-9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花式茶盤〉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單方框紅料篆款
故琺441	藏-318-9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花式茶盤〉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單方框紅料篆款
故琺446	列-625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三足爐〉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447	列-625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盒〉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448	列-625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瓶〉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449	列-621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仿鬥彩花蝶紋圓蓋罐〉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圈藍料楷款
故琺450	列-621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仿鬥彩花蝶紋圓蓋罐〉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圈藍料楷款
故琺451	列-515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白地藍花執壺〉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452	列-515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白地藍花執壺〉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455	列-510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包袱式罐〉	「乾隆年製」雙交圈雙行四字楷款
故琺456	列-510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包袱式罐〉	「乾隆年製」雙交圈雙行四字楷款
故琺457	列-637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桃式茶盤〉	「大清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458	列-637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桃式茶盤〉	「大清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460	列-514-1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石榴式瓶〉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461	列-514-2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石榴式瓶〉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466	呂-475-68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提梁壺〉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紅料楷款
故琺467	呂-475-68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提梁壺〉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紅料楷款
故琺470	呂-475-44-1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圓罐〉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故琺471	呂-475-44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圓罐〉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472	呂-475-78-1	〈清 乾隆銅胎廣琺瑯海棠式蓋罐〉	「乾隆年製」雙交圈雙行四字楷款
故琺473	呂-475-78	〈清 乾隆銅胎廣琺瑯海棠式蓋罐〉	「乾隆年製」雙交圈雙行四字楷款
故琺474	列-503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方瓶〉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藍料篆款
故琺475	列-503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方瓶〉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藍料篆款
故琺476	列-529	〈清 乾隆銅胎廣琺瑯包袱式蓋罐〉	「乾隆年製」雙交圈雙行四字楷款
故琺477	列-529	〈清 乾隆銅胎廣琺瑯包袱式蓋罐〉	「乾隆年製」雙交圈雙行四字楷款
故琺496	列-299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杯〉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497	列-299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盤〉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藍料楷款
故琺498	列-299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杯〉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499	列-299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盤〉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藍料楷款
故琺500	列-425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菊花方壺〉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圈藍料楷款
故琺512	呂-475-26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渣斗〉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紅料楷款
故琺513	呂-475-26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渣斗〉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紅料楷款
故琺514	藏-318-7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黃地彩花開光人物蓋碗〉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單方框紅料楷款
故琺515	藏-318-7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黃地彩花開光人物蓋碗〉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單方框紅料楷款
故琺516	藏-318-7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人物蓋碗〉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單方框紅料篆款
故琺517	藏-318-7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人物蓋碗〉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單方框紅料篆款
故琺519	列-513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石榴罐〉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520	列-513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石榴罐〉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故琺521	騰-39-1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花瓶〉（洋琺瑯）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522	騰-39-2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花瓶〉（洋琺瑯）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523	列-301-1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花觚〉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圈藍料楷款
故琺524	列-301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花觚〉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圈藍料楷款
故琺531	呂-475-60-1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雙耳蓋罐〉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532	呂-475-60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雙耳蓋罐〉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533	呂-475-74-1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海棠瓶〉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534	呂-475-74-2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海棠瓶〉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535	呂-475-74-1	〈清 乾隆銅胎廣琺瑯蓮瓣式蝶蟲蓋罐〉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紅料楷款
故琺536	呂-475-77	〈清 乾隆銅胎廣琺瑯蓮瓣式蝶蟲蓋罐〉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紅料楷款
故琺538	列-511-1	〈清 乾隆銅胎廣琺瑯包袱式蓋罐〉	「乾隆年製」雙交圈雙行四字楷款
故琺539	列-511-2	〈清 乾隆銅胎廣琺瑯包袱式蓋罐〉	「乾隆年製」雙交圈雙行四字楷款
故琺545	列-375-2	〈清 乾隆 金胎廣琺瑯花籃〉（內填琺瑯）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546	列-375-2	〈清 乾隆 金胎廣琺瑯花籃〉（內填琺瑯）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560	列-641	〈清 乾隆銅胎廣琺瑯包袱式蓋罐〉	「乾隆年製」雙交圈雙行四字楷款
故琺565	列-616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盒〉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566	列-616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盒〉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567	列-519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小圓盒〉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楷款
故琺568	列-519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小圓盒〉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楷款
故琺570	列-504-1	〈清 乾隆銅胎廣琺瑯西洋人物瓶〉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紅料楷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故琺571	列-504-2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西洋人物瓶〉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紅料楷款
故琺572	列-520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出戟蓋罐〉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573	列-520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出戟蓋罐〉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574	呂-475-62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花口蓋碗〉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紅料楷款
故琺575	呂-475-62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花口蓋碗〉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紅料楷款
故琺576	呂-475-62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海棠式盤〉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紅料楷款
故琺577	呂-475-62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海棠式盤〉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紅料楷款
故琺578	呂-488-4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黃色蓋罐〉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579	呂-488-4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黃色蓋罐〉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580	呂-475-2	〈清乾隆銅胎廣琺瑯瓶〉(內填琺瑯)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紅料楷款
故琺581	呂-475-2	〈清乾隆銅胎廣琺瑯瓶〉(內填琺瑯)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紅料楷款
故琺583	呂-475-72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杯〉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藍雙方框黑料楷款
故琺584	呂-475-72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盤〉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黑料楷款
故琺585	呂-488-5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團花蓋罐〉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586	呂-488-5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白地蓋罐〉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609	列-617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杯〉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610	列-617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盤〉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藍料楷款
故琺613	列-288	〈清乾隆銅胎廣琺瑯五彩人物片花瓶〉	「大清乾隆年製」雙行六字雙方框楷款
故琺614	列-288	〈清乾隆銅胎廣琺瑯五彩人物片花瓶〉	「大清乾隆年製」雙行六字雙方框楷款
故琺627	藏-318-3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黃地五彩開光人物爐架〉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單方框紅料篆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故琺628	藏-318-4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黃地五彩開光人物爐〉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楷款
故琺629	藏-318-4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黃地五彩開光人物瓶〉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楷款
故琺630	藏-318-4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黃地五彩開光人物盒〉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楷款
故琺631	呂-475-42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雙耳蓋罐〉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紅料楷款
故琺632	呂-475-42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雙耳蓋罐〉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紅料楷款
故琺633	列-505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出戟蓋罐〉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紅料楷款
故琺634	列-505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出戟蓋罐〉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紅料楷款
故琺635	藏-318-7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黃地彩花蓋碗〉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單方框紅料篆款
故琺636	藏-318-7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黃地彩花蓋碗〉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單方框紅料篆款
故琺637	藏-318-7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黃地彩花蓋碗〉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單方框紅料篆款
故琺638	藏-318-7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黃地彩花蓋碗〉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單方框紅料篆款
故琺641	呂-488-1	〈清乾隆銅胎廣琺瑯西洋人物瓶〉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單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642	呂-488-1	〈清乾隆銅胎廣琺瑯西洋人物瓶〉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單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643	呂-488-16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小瓶〉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紅料楷款
故琺644	呂-488-16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小瓶〉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紅料楷款
故琺645	呂-488-21	〈清乾隆銅胎廣琺瑯白地紅花罐〉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紅料楷款
故琺646	呂-475-10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觚式瓶〉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647	呂-475-10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觚式瓶〉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648	呂-475-69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蓋罐〉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紅料楷款
故琺649	呂-475-69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蓋罐〉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紅料楷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故琺650	列-289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六角瓶〉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藍料篆款
故琺651	列-289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六角瓶〉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藍料篆款
故琺656	呂-475-63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出戟蓋盅〉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紅料楷款
故琺657	呂-475-63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出戟蓋盅〉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紅料楷款
故琺658	呂-475-9-1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福壽瓶〉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單方框紅料篆款
故琺659	呂-475-9-2	〈清 乾隆銅胎廣琺瑯福壽長春瓶〉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單方框紅料篆款
故琺660	呂-475-54	〈清 乾隆銅胎廣琺瑯花蝶紋蓋罐〉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圈黑料楷款
故琺661	呂-475-54	〈清 乾隆銅胎廣琺瑯花蝶紋蓋罐〉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圈黑料楷款
故琺663	呂-475-45	〈清 乾隆銅胎廣琺瑯花蝶紋蓋罐〉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圈藍料楷款
故琺664	呂-475-16	〈清 乾隆銅胎廣琺瑯花蝶紋蓋罐〉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圈藍料楷款
故琺665	呂-475-7-1	〈清 乾隆款 銅胎廣琺瑯出戟蓋盅〉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楷款
故琺666	呂-475-7-2	〈清 乾隆款 銅胎廣琺瑯出戟蓋盅〉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楷款
故琺667	呂-475-41-1	〈清 乾隆銅胎廣琺瑯白地團花罐〉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668	呂-475-41-2	〈清 乾隆銅胎廣琺瑯白地團花罐〉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669	呂-475-15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雷紋獸耳啣環蓋罐〉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金彩楷款
故琺670	呂-475-15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雷紋獸耳啣環蓋罐〉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金彩楷款
故琺673	呂-488-26-1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海棠式盒〉（內填琺瑯）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674	呂-488-26-2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海棠式盒〉（內填琺瑯）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679	列-426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提梁滷銚〉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圈藍料楷款
故琺680	列-426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提梁滷銚〉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圈藍料楷款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故琺681	列-423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五色提梁卣〉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682	列-423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五色提梁卣〉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684	列-424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包袱式蓋罐〉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685	列-424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包袱式蓋罐〉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688	列-420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水盂〉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692	列-525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花籃〉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紅料楷款
故琺693	列-525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花籃〉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紅料楷款
故琺700	呂-535-60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臉盆〉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金彩篆款
故琺701	呂-535-60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臉盆〉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金彩篆款
故琺722	為-405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帶蓋罐〉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723	為-484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帶蓋罐〉	「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880	呂-475-32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包袱式蓋罐〉（洋琺瑯）	「乾隆年製」雙交圈雙行四字楷款
故琺881	呂-475-46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黃地五彩圓盒〉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882	呂-475-46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黃地五彩圓盒〉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883	呂-475-46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黃地五彩圓盒〉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884	呂-475-46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黃地五彩圓盒〉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952	呂-1663-10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蜻蜓花卉鼻煙壺〉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楷款
故琺975	餘-1235-10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番蓮五供-燭台〉（內填琺瑯）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976	餘-1235-10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番蓮五供-觚〉（內填琺瑯）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977	餘-1235-10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番蓮五供-爐〉（內填琺瑯）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故琺978	餘-1235-10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番蓮五供-燭台〉（內填琺瑯）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979	餘-1235-10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番蓮五供-觚〉（內填琺瑯）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藍料楷款
故琺995	霜-563-12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小盒〉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紅料楷款
故琺996	霜-563-12	〈清 乾隆 廣琺瑯小盒〉	「乾隆年製」雙行四字雙方框紅料楷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表三：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代乾隆朝銅胎畫琺瑯隨附木匣知見表

文物編號	木匣題銘	收儲器物	備註
故琺3N1	乾隆年製銅胎廣琺瑯壺一件	〈清 乾隆 廣琺瑯執壺罐〉	
故琺4N1	乾隆年製銅胎洋琺瑯六瓣提梁壺一對	〈清 乾隆 廣琺瑯團花提梁壺〉（洋琺瑯）一對	故琺4、故琺5
故琺25N1	乾隆年製銅胎琺瑯青轉枝蓮圓盒一對	〈清 乾隆 廣琺瑯白地藍花轉枝蓮圓盒〉一對	故琺25、故琺26
故琺27N1	乾隆年製銅胎琺瑯青轉枝蓮圓盒一對	〈清 乾隆 廣琺瑯白地藍花轉枝蓮圓盒〉一對	故琺27、故琺28
故琺98N2	乾隆年製銅胎畫琺瑯爐瓶三式一分	〈清 乾隆 銅胎畫琺瑯盒〉、〈清 乾隆 銅胎畫琺瑯瓶〉、〈清 乾隆 銅胎畫琺瑯爐〉	故琺97、故琺98、故琺99
故琺101N1	乾隆年製銅胎畫琺瑯蓋碗一件	〈清 乾隆 廣琺瑯蓋碗〉	
故琺102N1	乾隆年製銅胎廣琺瑯銚一對	〈清 乾隆 廣琺瑯牡丹方壺〉一對	故琺102、故琺103
故琺104N1	乾隆年製銅胎琺瑯四季花盤一件	〈清 乾隆 銅胎琺瑯四季花盤〉	
故琺105N1	乾隆年製銅胎廣琺瑯小魚缸一件	〈清 乾隆 廣琺瑯小魚缸〉	
故琺106N1	乾隆年製銅胎畫琺瑯包袱式蓋罐一對	〈清 乾隆 廣琺瑯包袱式蓋罐〉	故琺106、故琺107木匣所盛為廣琺瑯
故琺160N1	乾隆年製銅胎洋琺瑯石榴式瓶一對	〈清 乾隆 廣琺瑯石榴式瓶〉一對（洋琺瑯）	故琺160、故琺161
故琺182N1	乾隆年製銅胎畫琺瑯西洋人物蓋罐一件	〈清 乾隆 銅胎琺瑯西洋人物蓋罐〉	
故琺183N1	乾隆年製銅胎廣琺瑯圓盒一件	〈清 乾隆 銅胎琺瑯圓盒〉	木匣所盛並非廣琺郎
故琺184N1	乾隆年製銅胎廣琺瑯西番蓮圓盒一件	〈清 乾隆「敬製」款廣琺瑯番蓮紋蓋盒〉	
故琺185N1	乾隆年製銅胎廣琺瑯盃盤一分	〈清 乾隆 廣琺瑯黃地九壽杯〉、〈清 乾隆 廣琺瑯黃地九壽盤〉	故琺185、故琺186、
故琺187N1	乾隆年製銅胎畫琺瑯腰圓盒三件	〈清 乾隆 銅胎畫琺瑯橢圓盒〉	故琺187、故琺188、故琺189
故琺190N1	乾隆年製銅胎廣琺瑯花籃一件	〈清 乾隆 廣琺瑯黃地牡丹花籃〉	
故琺191N1	乾隆年製銅胎畫琺瑯萬福萬壽如意一柄	〈清 乾隆 銅胎畫琺瑯萬福萬壽如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故琺192N1	乾隆年製銅胎畫琺瑯蕉葉花卉參斗一件	〈清 乾隆 銅胎畫琺瑯百花渣斗〉	
故琺295N1	乾隆年製銅胎洋琺瑯海棠式盒一對	〈清 乾隆 廣琺瑯海棠式盒〉（洋琺瑯）	故琺295、故琺296
故琺297N1	乾隆年製銅胎廣琺瑯包袱罐一件	〈清 乾隆 廣琺瑯包袱罐〉	
故琺298N1	乾隆年製銅胎洋琺瑯小圓盒一對	〈清 乾隆 廣琺瑯小圓盒〉（洋琺瑯）	故琺298、故琺299
故琺302N1	乾隆年製銅胎洋琺瑯提梁壺一對	〈清 乾隆 廣琺瑯提梁壺〉（洋琺瑯）	故琺302、故琺303
故琺304N1	乾隆年製銅胎洋琺瑯滷壺一對	〈清 乾隆 廣琺瑯滷壺〉（洋琺瑯）	故琺304、故琺305
故琺306N1	乾隆年製銅胎洋琺瑯石榴式瓶一對	〈清 乾隆 廣琺瑯石榴式瓶〉（洋琺瑯）	故琺306、故琺307
故琺308N1	乾隆年製銅胎洋琺瑯石榴式瓶一對	〈清 乾隆 廣琺瑯石榴式瓶〉（洋琺瑯）	故琺308、故琺309
故琺310N1	乾隆年製銅胎畫琺瑯包袱錦蓋罐一件	〈清 乾隆 銅胎琺瑯包袱錦蓋罐〉	
故琺311N1	乾隆年製銅胎琺瑯五彩西番蓮蓋鍾一件	〈清 乾隆 廣琺瑯黃地西番蓮蓋鍾〉	
故琺312N1	乾隆年製銅胎洋琺瑯小圓盒一對	〈清 乾隆 廣琺瑯小圓盒〉（洋琺瑯）	故琺312、故琺313
故琺442N2	乾隆年製銅胎畫琺瑯挑杆花籃龍掛香筒一分	〈清 乾隆 銅胎畫琺瑯挑杆花籃龍掛香筒〉	
故琺443N1	乾隆年製銅胎画法瑯雙蠶耳西洋人撒口罐一件	〈清 乾隆 銅胎画法瑯帶耳罐〉	
故琺446N1	乾隆年製銅胎廣琺瑯鑪瓶盒一分	〈清 乾隆 廣琺瑯三足爐〉、〈清 乾隆 廣琺瑯盒〉、〈清 乾隆 廣琺瑯瓶〉	故琺446、故琺447、故琺448
故琺449N1	乾隆年製銅胎廣琺瑯圓蓋罐一對	〈清 乾隆 廣琺瑯仿鬥彩花蝶紋圓蓋罐〉	故琺449、故琺450
故琺451N1	銅胎廣法瑯滷銚一	〈清 乾隆 廣琺瑯白地藍花執壺〉	木匣上題銘為行楷墨書，故琺451、故琺452
故琺453N1	乾隆年製銅胎畫琺瑯石榴花鳥蓋罐一對	〈清 乾隆 銅胎畫琺瑯石榴花鳥蓋罐〉	故琺453、故琺454
故琺455N1	乾隆年製銅胎廣琺瑯包袱式罐一對	〈清 乾隆 廣琺瑯包袱式罐〉	故琺455、故琺4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故琺457N1	乾隆年製銅胎琺瑯桃式茶盤一對	〈清 乾隆 廣琺瑯桃式茶盤〉	故琺457、故琺458
故琺545N1	乾隆年製金胎廣琺瑯花籃一對	〈清 乾隆 廣琺瑯花籃〉	故琺545、故琺546
故琺548N1	乾隆年製銅胎琺瑯人物雙耳罐一件	〈清 乾隆 銅胎琺瑯人物雙耳罐〉	
故琺553N1	乾隆年製銅胎畫琺瑯壺一件	〈清 乾隆 銅胎畫琺瑯壺〉	
故琺556N1	乾隆年製銅胎畫琺瑯撇口小瓶一對	〈清 乾隆 銅胎畫琺瑯撇口小瓶〉	故琺556、故琺557
故琺558N1	乾隆年製銅胎畫琺瑯黃地蕉葉銅足奓斗一件	〈清 乾隆 畫琺瑯山水渣斗〉	
故琺559N2	乾隆年製銅胎畫琺瑯珊瑚頂喜相逢滷壺一件	〈清 乾隆 畫琺瑯喜相逢滷壺〉	
故琺560N1	乾隆年製銅胎畫琺瑯包袱式蓋罐一件	〈清 乾隆 廣琺瑯包袱式蓋罐〉	
故琺564N1	乾隆年製銅胎畫西洋人蕉葉奓斗一件	〈清 乾隆 銅胎琺瑯奓斗〉	
故琺565N1	乾隆年製銅胎琺瑯盒兩件	〈清 乾隆 廣琺瑯盒〉	
故琺567N1	乾隆年製銅胎廣琺瑯小圓盒一對	〈清 乾隆 廣琺瑯小圓盒〉	
故琺569N1	乾隆年製銅胎琺瑯西番蓮膽瓶一件	〈清 乾隆 銅胎琺瑯西番蓮膽瓶〉	
故琺598N2	乾隆年製銅胎琺瑯大蓋碗一件	〈清 乾隆 畫琺瑯花薰〉	
故琺606N1	乾隆年製銅胎畫琺瑯萬福萬壽菓托一件	〈清 乾隆 銅胎琺瑯黃地果盒〉	
故琺607N1	乾隆年製銅胎畫琺瑯銅耳西洋人物花瓶一件	〈清 乾隆 銅胎畫琺瑯帶耳長頸瓶〉	
故琺609N1	乾隆年製銅胎琺瑯杯盤一件	〈清 乾隆 廣琺瑯杯盤〉	
故琺611N1	乾隆年製銅胎畫琺瑯西洋人物大小碟二件	〈清 乾隆 畫琺瑯西洋人物碟〉	
故琺880N1	乾隆年製銅胎洋琺瑯包袱式蓋罐一件	〈清 乾隆 廣琺瑯包袱式蓋罐〉（洋琺瑯）	
故琺881N1	乾隆年製銅胎黃地五彩琺瑯圓盒二對	〈清 乾隆 廣琺瑯黃地五彩圓盒〉	故琺881、故琺882、故琺883、故琺88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匯編》，北京：檔案出版社，1984-85。
《清宮粵港澳商貿檔案全集》，北京：中國書店，200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廣州荔灣區人民政府合編
《清宮廣州十三行檔案精選》，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200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
《宮中檔康熙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1977。
清室善後委員會編
《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北京市：線裝書局，2004。
梁廷枏
《粵海關志》，廣州：廣東人民 版社，2002。

近人論著

王竹平
2012 〈從科學分析文獻回顧看琺瑯彩、洋彩與粉彩的分類與命名〉，《故宮學術季刊》，29卷3期，頁115-155。
Wang, Chu-ping
2012 “Cong kezue fenxi wenxian huigu kan falangcai yu fencai de fenlei yu mingming (Nomenclature for Painted Enamel on Porcelain in Qing Dynasty: A Scientific Viewpoint),”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esearch Quarterly*, 29:3, pp. 115-155.
王竹平
2012 〈法國製造的印記——談康熙款金胎雕刻內填琺瑯花卉碗〉，《故宮文物月刊》，349期，頁112-121。
Wang, Chu-ping
2012 “Feguo zhizai de yinji: tan Kangxikuang jintai diaoke neitian falang huahui wan (A Pressed Mark of Made in France: Discussion on a Kangxi Mark Low-cutting Gold Bowls),”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Monthly of Chinese Art*, 349, pp. 112-1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王竹平
2013 〈金紅彩料在康雍時期琺瑯彩瓷的使用情形〉,《金成旭印》，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3，頁298-313。
Wang, Chu-ping
2013 "Jinhung cailiao zai Kangyong shiqi falangcaici de shiyong qingxing (The Use of Ruby-gold Enamel in the *falang cai* Porcelain of Kangxi and Yongzheng Periods)," *Jincheng xuyin* (Porcelain with painted enamels of Qing Yongzheng period, 1723-1735), pp. 298-313.
王光堯
2010 〈雍正時期御窯制度的建設〉,《為君難：雍正其人其事及其時代》，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頁389-404。
Wang, Guang-yao
2010 "Yongzheng shiqi yuyao zhidu de jianshe (The 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kiln institution during the Yongzheng period)," *Weijunnan: Yongzheng qiren qishi jiqi shidai* (The complexities and Challenges of Rulerships: Emperor Yongzheng and His Accomplishments in His Time),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pp. 389-404.
王光堯
2010 〈乾隆時期御窯廠的管理體制與官樣制度〉,《宮廷與地方：17至18世紀的技術交流》，北京：紫禁城出版社，頁31-76。
Wang, Guang-yao
2010 "Qianlong shiqi yuyaochang de quanli zhidu yu guanyang zhidu (Imperial Court and Distric: The Technology exchanges during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Gongting yu defang: shiqi zhi shiba shiji de jishu jiaoliu* (Imperial Court and Distric: The Technology exchanges during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Beijing: Forbidden City, pp. 31-76.
石守謙、馮明珠主編
2002 《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Shih, Shou-chien and Feng, Min-chu eds.
2002 *Qianlong huadi de wenhua da ye* (Emperor Ch'ien Lung's Grand Cultural Enterprise),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朱家溍
1982 〈清代畫琺瑯器製造考〉,《故宮博物院院刊》，第3期，頁67-76。
Zhu, Jia-zin
1982 "Qingdai huafalangqi zhizaokao (Investigation to the Qing Period Painted Enamelware)," *Palace Museum Journal*, 3, pp. 67-76.
呂堅
1981 〈康熙款畫琺瑯瑣議〉,《故宮博物院院刊》，第3期，頁93-9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Lu, Jian
1981 "Kangxikuan Huafalang suoyi (Some Thoughts on the Painted Enameledwares of Kangxi Mark)," *Palace Museum Journal*, 3, pp. 67-76.
李久芳主編
2001 《金屬胎琺瑯器》，香港：商務書局。
Li, Jiu-fang ed.
2001 *Jingshutai falangqi* (Metal-bodied enamelware), Hong Kong: Shangwu shuju.
李久芳主編
2004 《鼻煙壺》，香港：商務書局。
Li, Jiu-fang ed.
2004 *Biyanhu* (Snuff Bottles), Hong Kong: Shangwu shuju.
余佩瑾
2006 〈唐英與雍乾之際官窯的關係——以清宮琺瑯彩瓷的繪製與燒造為例〉，《故宮學術季刊》，第24卷第1期，頁1-44。
Yu, Pei-chin
2006 "Tang Ying yu Yongqian zhiji Guanyao de kuangxi: yi Qinggong falangcaici de huizhi yu shouza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ng Ying and Imperial Kilns of the Yung-cheng and Ch'ien-lung Time Period: Taking the Painting and Manufacture of Fa-lang Porcelain as an Example),"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esearch Quarterly*, 24:1, pp. 1-44.
余佩瑾
2009 〈匠外之作—從唐英《陶成紀事碑》看雍正官窯燒造及帝王品味的問題〉，《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頁414-427。
Yu, Pei-chin
2009 "Jiangwai zhizuo: cong Tang Ying *Taocheng jishibei* kan Yongzheng guangyao shaozao ji diwang pinwei de wenti (Works Beyond the workmanship: into the questions of Yongzheng imperial wares and emperor's taste with reference to Tang Yin's *Taocheng jishibei*)," *Yongzheng: Qing shizong wenwu dazhan tulu* (Illustrated Catalogue to "Harmony and Integrity: The Yongzheng Emperor and His Times Special Exhibition"),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pp. 414-427.
余佩瑾
2010 〈清乾隆《陶冶圖冊》的繪製背景與創作意圖〉，《故宮文物月刊》，第326期，頁14-23。
Yu, Pei-chin
2010 "Qing Qianlong Taoyetuche de huizhi Beijing yu changzuo yitu (The intention of making *Taoyetuche* of the Qianlong reig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Monthly of Chinese Art*, 326, pp. 14-23.
余佩瑾
2011 《乾隆官窯研究：做為聖王的理想意象》，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Yu, Pei-chin
2011 “Qianlong Guangyao yanyou: zhuowei Shengwang de lixiang yixian (A study of Qianlong official wares and the ideal of a sagacious ruler),” Ph.D. dissertation ,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林莉娜
2002 〈清朝皇帝與西洋傳教士〉,《故宮文物月刊》, 236期，頁42-69。
Lin, Li-na
2002 “Qingchao huangdi yu xiyang chuangjiaoshi (Qing Emperors and Western Missionary),”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Monthly of Chinese Art*, 236, pp. 42-69.
易穎梅
2010 〈「皮球花」紋起源：以故宮所藏康雍乾三朝器物為中心〉,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東亞與歐洲工藝美術交流〉課程2010年1月學期報告。
Yi, Yin-mei
2010 “‘Piqiohua’wen chiyuan: yi gugong suocang Kang Yong Qian sancao qiwu wen zhongsin (The Origin of “*piqio*” floral design: Discussion focusing on the works of Kangxi, Yongzheng and Qianlong periods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Collection),” Term paper, “The exchange of decorative arts between East Asia and Europe from the 16th to 19th centuries” course,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故宮博物院、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1987 《清代廣東貢品》,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The Palace Museum and the Art Galler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ds.
1987 *Qingdai Guangdong gongpin* (Tributes from Guangdong to the Qing Court), Hong Kong: The Art Galler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施靜菲
2012 《日月光華：清宮畫琺瑯》,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Shih, Ching-fei
2012 *Reyue guanghua: qinggong huafalang* (Radiant Luminanace: The Painted Enamelware of the Qing Imperial Court),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施靜菲、彭盈真
2012 〈從文化脈絡探討清代釉上彩名詞：「琺瑯彩」、「洋彩」與「粉彩」〉,《故宮學術季刊》, 第29卷第3期，頁1-74。
Shih, Ching-fei and Peng, Yin-cheng
2012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ree Terms for Qing Dynasty Overglazed Enamels: Falangcai, Yangcai, and Fencai,”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esearch Quarterly*, 29:3, pp. 1-74.
許曉東
2010 〈康熙、雍正時期宮廷與地方畫琺瑯技術的互動〉,《宮廷與地方：17至18世紀的技術交流》,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頁271-33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Xu, Xiao-dong
2010 "Kangxi, Yongzheng shiqi gongting yu difang huafalang jishu de hudong (The exchanges of technology between the Imperial Court and Provincial Metropolis during the Kangxi and Yongzheng period)," *Gongting yu defang: shiqi zhi shiba shiji de jishu jiaoliu* (Imperial Court and Provincial Metropolis: The Exchanges of Technology during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Beijing: Forbidden City, pp. 271-335.

嵇若昕
2005 〈十八世紀宮廷牙匠及其作品研究〉,《故宮學術季刊》, 第23卷第1期, 頁467-530。

Chi, Jo-hsin
2005 "Shiba shiji gongting yajiang ji qi zuopin yanjou (Ivory Artisans and Their Work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ourt),"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esearch Quarterly*, 23:1, pp. 467-530.

嵇若昕
2006 〈乾隆時期的如意館〉,《故宮學術季刊》, 23卷3期, 頁127-152+159。

Chi, Jo-hsin
2006 "Qianlong shiqi de Ruyiguang (The Hall of Self-Fulfillment in the Ch'ien-lung Court),"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esearch Quarterly*, 23:3, pp. 127-152+159.

嵇若昕
2006 〈乾隆朝內務府造辦處南匠薪資及其相關問題研究〉, 收於陳捷先、成崇德、李紀祥主編,《清史論集》, 上冊, 北京：人民出版社, 頁519-575。

Chi, Jo-hsin
2006 "Qianlong neiwufu zaobanchu Nanjiang xinzi ji qi xiangguan wenti yanjou (A Study on the salary of Southern Artisans and other related questions in the Qianlong Imperial Household Workshops)," in Chen, Chieh-hsien, Cheng, Chong-de, Li, Ji-xiang eds., *Qingshi lunji* (Collected Essayes on Qing History),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pp. 519-575.

嵇若昕主編
2006 《天工寶物》,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Chi, Jo-hsin ed.
2006 *Tiangong baowu* (Treasures from the Working of Nature: Eight Thousand Years of Antiquities),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莊吉發
1984 〈得勝圖—清代的銅版畫〉,《故宮文物月刊》, 15期, 頁102-109。

Chuang, Chi-fa
1984 "Deshengtu: Qingdai de tungbanhua (The Conquest of the Western Frontier: the Copperplate Prints of the Qing Period),"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Monthly Journal of Chinese Art*, 15, pp. 102-1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莊吉發
1993〈錐拱雕鏤、賦物有象：唐英督陶文獻〉,《故宮文物月刊》, 129期，頁62-71。
Chuang, Chi-fa
1993 "Zhueigong diaolo fuwu youxian: Tang Ying dutao wenxian (Thriling, Sculpturing, Carving and Engraving; composing objects with appearances: the document of Tang Yin's supervising pottery-firing),"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Monthly Journal of Chinese Art*, 129, pp. 62-71.
陳夏生
1999《明清琺瑯器展覽圖錄》,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Chen, Hsia-sheng
1999 *Ming Qing falangqi zhanglan tulu* (Enamel Ware in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陳國棟
1980〈清代前期粵海關監督的派遣（1683-1842）〉,《史原》, 第10期，頁139-168。
Chen, Kuo-tung
1980 "Qing chengqi yuehai guan jiandu de pieqian (1683-1842) (Dispatch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Guangdong Maritime Customs in Early Qing Period)," *Shiyuan* (The Journal of Historical Review), vol.10, pp. 139-168.
陳國棟
1982〈粵海關的利益分配：粵海關監督的角色與功能〉,《食貨月刊》, 復刊第12卷第1期，頁19-33。
Chen, Kuo-tung
1982 "Yuehaiguan de liyi fenpei: Yuehaiguan jiandu de jiaose yu gongneng (The Allocation of Interest in the Guangdong Maritime Customs: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Guangdong Maritime Customs)," *shihuo yuekan*, republished 12:1, pp. 19-33.
陳國棟
2012〈內務府官員的外派、外任：與宮廷文物供給之間的關係〉,《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 第三十三期，頁225-269。
Chen, Kuo-tung
2012 "Imperial Bondservants' Provincial Positions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Acquisition of Objets d'Arts for Emperor Qianlong's Court," *Taida Journal of Art History*, 33, pp. 225-269.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
1984《清代畫琺瑯特展目錄》,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ed.
1984 *Qingdai huafalang tezheng mulu* (Qing Painted Enamelware Special Exhibition Catalogue),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
1992 《清宮中琺瑯彩瓷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ed.
1992 *Qinggong zhong falangcaici tezheng* (Falangcai Enameled porcelains Special Exhibition),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黃聖芝
2011 《廣彩外銷瓷研究》，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Huang, Sheng-zhi
2011 *Guancai waixiaoci yanjou* (A Study of Canton Export Porcelain), M.A. Dissertation,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傅振倫等編
1982 〈唐英瓷務年譜長編〉,《景德鎮陶瓷》，第2期，頁19-20。
Fu, Zheng-lun et al.
1982 "Tang Ying ciwu nianpu changbian (The edited chronicle of Tang Ying)," *Jingdezhen Taoci*, 2, pp. 19-20.
張發穎主編
2008 《唐英全集》，北京：學苑出版社。
Zhang, Fay-ing ed.
2008 *Tang Ying quanji* (The Complete Works of Tang Ying), Beijing: Xueyuan chubanshe.
張臨生
1983 〈試論清宮畫琺瑯工藝發展史〉,《故宮季刊》，第17卷第3期，頁25-38。
Chang, Lin-sheng
1983 "Shilun qinggong huafalang gongyi fazhangshi (Discussion on Qing Court Huafalang handicraft development history),"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Quarterly*, 17:3, pp. 25-38.
張麗
2005 〈描金畫琺瑯芻議〉,《故宮博物院院刊》，第4期，頁25-32。
Zhang, li
2005 "Miaojin huafalang cuyi chutan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gold outline painted enamelware)," *Palace Museum Journal*, 4, pp. 25-32.
楊伯達
1980 〈康熙款畫琺瑯初探〉,《故宮博物院院刊》，第4期，頁42-48。
Yang, Bo-da
1980 "Kangxi huafalang chutan (The First Investigation to the Painted Enamelware with Kangxi Mark)," *Palace Museum Journal*, 4, pp. 42-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楊伯達
1981〈景泰款掐絲琺瑯的真相〉,《故宮博物院院刊》,第2期,頁20。
Yang, Bo-da
1981 "Jingtai kuang chiasi falang de zhengxian (The Real Facts of the Cloisonée with Jingtai Mark)," *Palace Museum Journal*, 2, p. 20.
楊伯達
1986〈清乾隆五十九年廣東貢物一瞥〉,《故宮博物院院刊》,第3期,頁3-10+97-98。
Yang, Bo-da
1986 "Qing Qianlong wushijiu nian Guangdong gongwu yibie (A Glance on the Tributes from Guangdong in the Year of 59th , Qianlong reign, Qing Period)," *Palace Museum Journal*, 3, pp. 3-10+97-98.
楊伯達
1987〈十八世紀清內廷廣匠史料紀略〉,《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18期,頁119-137。
Yang, Bo-da
1987 "Shiba shiji Qing neiting Guanjiang shiliao jilue (A Brief Account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Guangdong Artisans Serving in the Ch'ing Cour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18, pp. 119-137.
楊伯達
1987〈從清宮舊藏十八世紀廣東貢品管窺廣東工藝的特點與地位〉,《清代廣東貢品》,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頁10-38。
Yang, Bo-da
1987 "Cong Qinggong jiucang shiba shiji Guangdong gongpun guanguei Guangdong gongyi de tedian yu diwei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tatus of Guangdong Handicrafts as seen from Eighteen Century Tributes from Guangdong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Former Qing Palace)," *Qingdai Guangdong gongpin* (Tributes from Guangdong to the Qing Court), pp. 10-38.
葉佩蘭、蔡毅主編
1999《琺瑯彩、粉彩》,香港:商務出版社。
Ye, Pei-lan and Cai, Yi eds.
1999 *Falangcai, fencai* ('falang' and 'fencai' enameled porcelains), Hong Kong: Shangwu chubanshe.
廖寶秀編
2009《華麗彩瓷:乾隆洋彩》,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Liao, Po-hsiu ed.
2009 *Hualicaici: Qianlong yangcai* (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Stunning Decorative Porcelains from the Ch'ien-lung reign),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廖寶秀
2009〈附錄：端凝殿、養心殿磁胎洋彩及其製作年代〉,《華麗彩瓷：乾隆洋彩》,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頁266-282。
Liao, Po-hsiu
2009 "Fulu: Duanning dian, Yangxin dian citai yangcai ji qi zhizuo niandai (Appendix: The List of 'yangcai' porcelains in the Duanning and Yangxin Palace and their dating)," in *Hualicaici: Qianlong yangcai* (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Stunning Decorative Porcelains from the Ch'ien-lung reign),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pp. 266-282.
廖寶秀
2009〈乾隆磁胎洋彩綜述〉,《華麗彩瓷：乾隆洋彩》,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頁10-31。
Liao, Po-hsiu
2009 "Qinglong citai yangcai zongshu (The General Description on Qinglong porcelain-based "yangcai")," in *Hualicaici: Qianlong yangcai* (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Stunning Decorative Porcelains from the Ch'ien-lung reign),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pp. 10-31.
香港歷史博物館等
2005《東西匯流：粵港澳文物大展》, 香港：香港歷史博物館。
Hong Kong Museum of History et al. eds.
2005 *Dongxi Huiliu: Yuegangau weuwu dazhang* (East Meets West: Cultural Relics from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Hong Kong: Hong Kong Museum of History.
賴毓芝
2012〈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75期，頁35-36（1-76）。
Lai, Yu-chih
2012 "Picturing Empire: Illustrations of "Official Tribute" at the Qianlong Court and the Making of the Imperial Capital,"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vol.75, pp. 35-36 (1-76).
劉潞主編
1998《清宮西洋儀器》, 香港：商務印書館。
Liu, Lu ed.
1998 *Qinggong xiyang yiqi* (Western Instruments of the Qing Court), Hong Kong: Shangwu yinshuguang.
鐵源、李國榮主編
2008《清宮瓷器檔案全集》, 北京市：中國畫報出版社。
Tie, Yuan and Li, Guo-rong eds.
2008 *Qinggong ciqi dongan quanji* (The Complete Archives of the Qing Court porcelain), Beijing: Zhongguo huabao chubansh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Brinker, Helmut and Albert Lutz
1989 *Chinese Cloisonné: The Pierre Uldry Collection*, Zurich: Asia Society.
Curtis, E. B.
2008 *Glass Exchange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1550-1800*, Surrey: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Ferguson, John C.
1939 *Survey of Chinese Art*,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Garner, Harry
1971 *Chinese and Japanese Cloisonne Enamel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Gillingham, Michael
1978 *Chinese Painted Enamels*, Oxford: Ashmolean Museum.
Jenyns, Soame R. and William Watson
1980 *Chinese Art, Minor art II: gold, silver, later bronzes, cloisonné, Cantonese enamel, lacquer, furniture, wood*, Oxford: Phaidon.
Jourdain, Margaret and R. Soame Jenyns
1950 *Chinese Export Ar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Country Life Limited;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Kerr, Rose
2000 "What were the Origins of Chinese *Famille Rose?" Orientations*, vol. 31, no.5, pp. 53-59.
Moss, Hugh
1976 *By Imperial Command: An Introduction to Ch'ing Imperial Painted Enamels*, Hong Kong: Hibiya.
The Chinese porcelain company
1993 *Chinese Painted Enamels of the 18th Century*, New York: The Chinese Porcelain Company.
Watt, James
1996 "The Antique-Elegant," *Possessing the Past: treasures fro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New York :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pp. 518-519.

（翻譯：施靜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版出處

圖1　清 康熙 銅胎畫琺瑯黃地花卉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　清 乾隆 銅胎畫琺瑯西洋人物觀音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　清 雍正 瓷胎畫琺瑯花鳥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　清 乾隆 瓷胎洋彩紅地團花山水湯碗與木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5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花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6　廣東琺瑯罐 18世紀（約1790） 英國VAM博物館藏
圖7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鼻煙壺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8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西洋風景人物大罐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出自藏品大系：《清畫琺瑯》圖66
圖9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西洋風景人物大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0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黃地開光人物蓋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1　德國奧古斯堡畫琺瑯杯及銅版畫稿本 德勒斯登國家藝術博物館（Staatliche Kunstsammlungen Dresden）
圖12　清 康熙（廣東）銅胎畫琺瑯粉紅地山水文盒（無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3　清 雍正款 （廣東）銅胎廣琺瑯黃地花卉鼻煙壺 《鼻煙壺》，圖132 北京故宮博物院
圖14　清 乾隆朝「洋琺瑯碟」稿樣 引自《宮廷與地方》頁313 北京故宮博物院
圖15　清 十八世紀 無款 廣東琺瑯 纏枝蓮紋委角方盒 《清畫琺瑯》，圖213 北京故宮博物院
圖16A　清 康熙 康熙金胎畫琺瑯黃地花卉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16B　清 乾隆 金胎廣琺瑯黃地花卉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7A　清 康熙 銅胎畫琺瑯黃地菊花方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7B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黃地菊花方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8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仿鬥彩花蝶紋圓蓋罐一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9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白地藍花執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0　清 乾隆 銅胎畫琺瑯四季花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1　清 乾隆 銅胎畫琺瑯帶耳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2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包袱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3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花卉渣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4A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西洋人物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4B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西洋人物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5　清 乾隆 金胎廣琺瑯花籃（內填琺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6　清 乾隆 金胎廣琺瑯番蓮碗（內填琺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7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黃地花卉方壺一對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28A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小圓盒一對與木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8B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小圓盒一對與木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9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黃地牡丹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0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仿成窯蓋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1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三足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2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荷葉式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3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蓮瓣式蓋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4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海棠式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5　清 十八世紀 廣東琺瑯西洋風景人物盤 *Chinese Painted Enamels of the 18th Century*, p.76.
圖36　清 乾隆 紫檀木嵌琺瑯邊鑲玻璃畫 引自《清代廣東貢品》圖91-92
圖37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花式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38　清 嘉慶 銅胎廣琺瑯藍地包袱小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39　清 十八世紀 透明琺瑯貼金銀箔八寶紋盆 《清畫琺瑯》圖171
圖40　清 十八世紀 廣東外銷琺瑯高足蓋碗、碟 *Chinese Painted Enamels of the 18th Century*, p.6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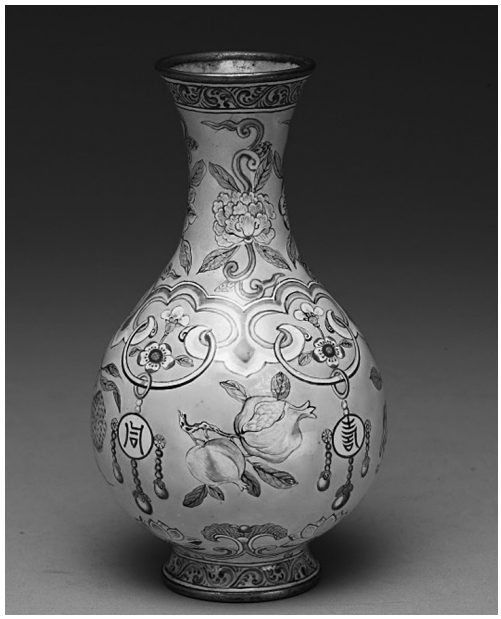


圖1　清 康熙 銅胎畫琺瑯黃地花卉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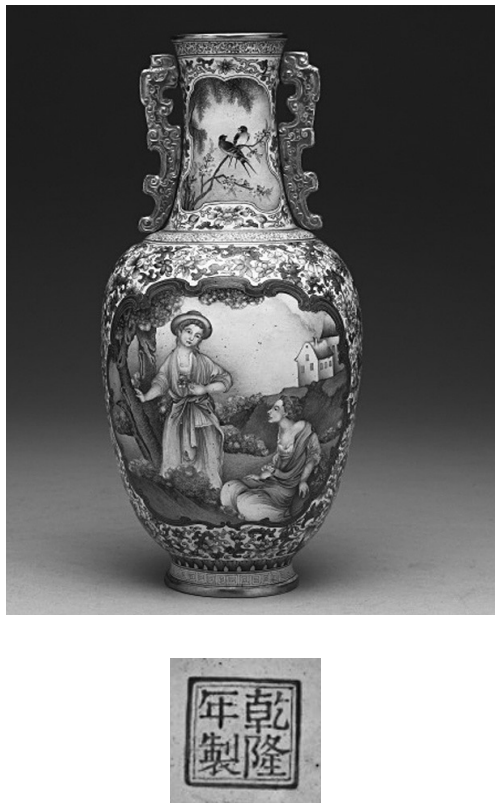


圖2　清 乾隆 銅胎畫琺瑯西洋人物觀音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　清 雍正 瓷胎畫琺瑯花鳥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4 清 乾隆 瓷胎洋彩紅地團花山水湯碗與木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5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花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6　廣東琺瑯罐 18 世紀（約1790）英國VAM 博物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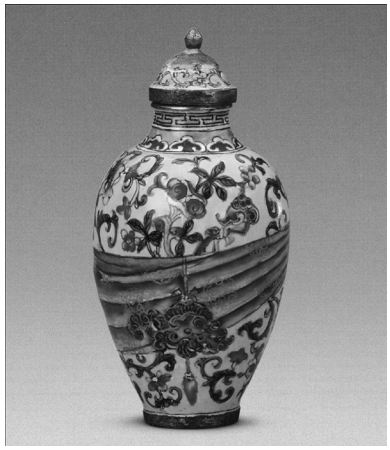




圖7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鼻煙壺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8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西洋風景人物大罐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出自藏品大系：《清畫琺瑯》圖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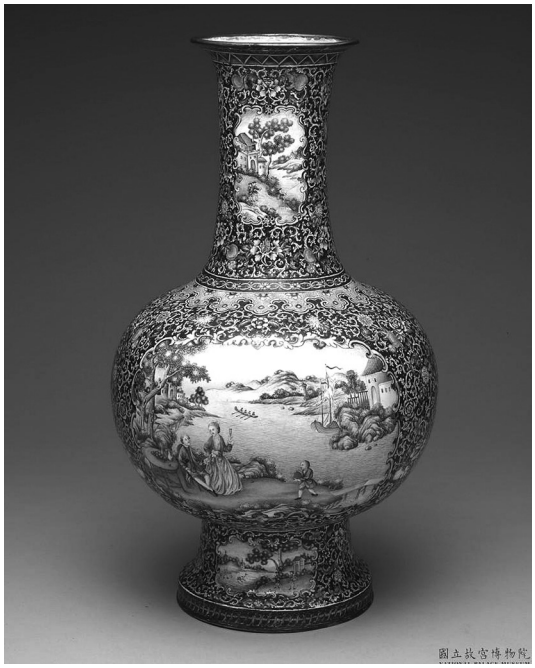




圖9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西洋風景人物大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0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黃地開光人物蓋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1 德國奧古斯堡畫琺瑯杯及銅版畫稿本
德勒斯登國家藝術博物館（StaatlicheKunstsammlungen Dresde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2 清 康熙 （廣東）銅胎畫琺瑯粉紅地山水盒（無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3 清 雍正款 （廣東）銅胎畫琺瑯黃地花卉鼻煙壺
引自《鼻煙壺》，圖132
北京故宮博物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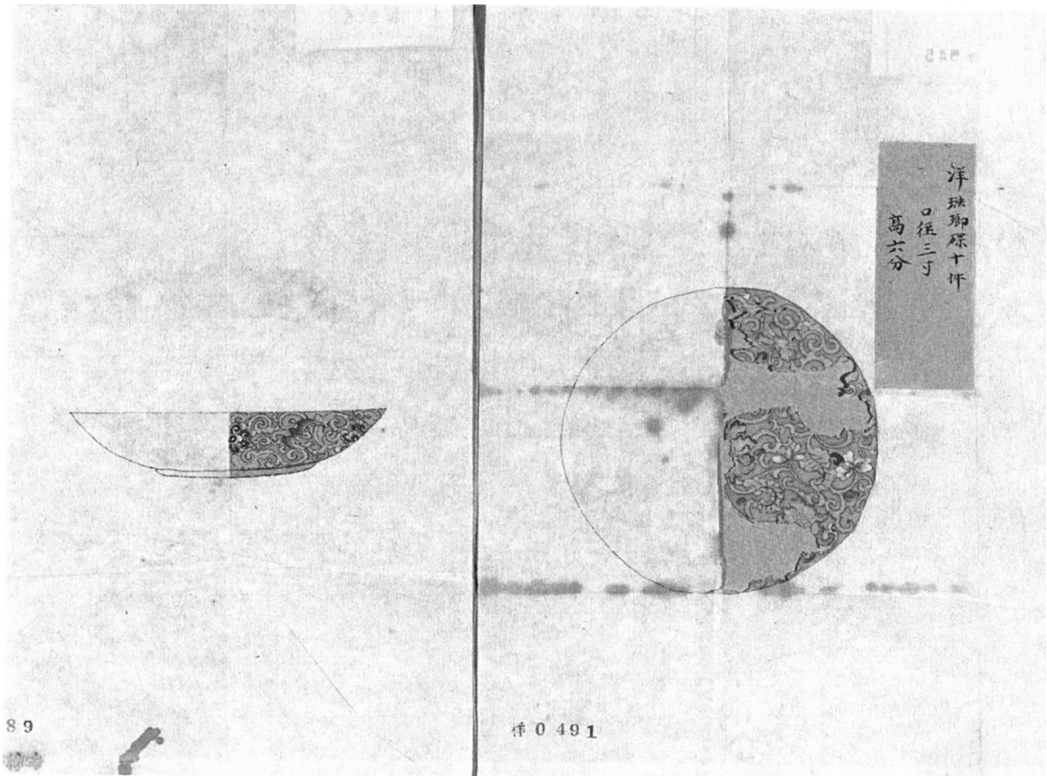


圖14　乾隆朝「洋琺瑯碟」稿樣
引自《宮廷與地方》頁313
北京故宮博物院



圖15　清　十八世紀　無款　廣東琺瑯　纏枝蓮紋委角方盒《清畫琺瑯》圖213 北京故宮博物院

臺灣藝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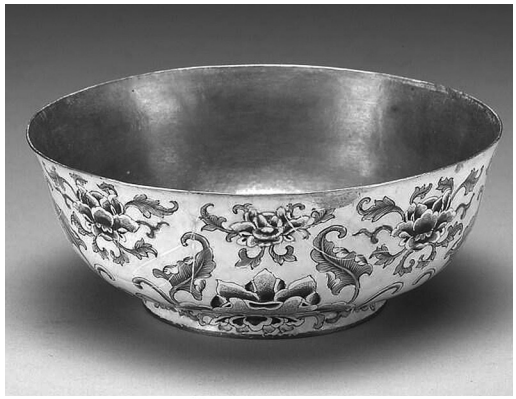




圖16A 清 康熙 金胎畫琺瑯黃地花卉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6B 清 乾隆 金胎廣琺瑯黃地花卉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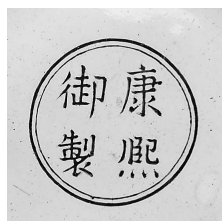


圖17A 清 康熙 銅胎畫琺瑯黃地菊花方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7B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黃地菊花方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8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仿鬥彩花蝶紋圓蓋罐一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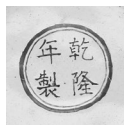




圖19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白地藍花執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0 清 乾隆 銅胎畫琺瑯四季花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1　清 乾隆 銅胎畫琺瑯帶耳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2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包袱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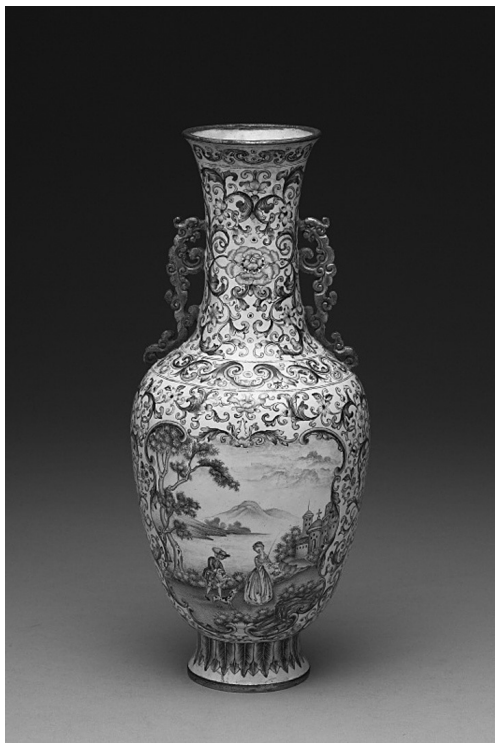




圖23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花卉渣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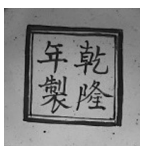


圖24A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西洋人物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4B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西洋人物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5　清 乾隆 金胎廣琺瑯花籃（內填琺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6 清 乾隆 金胎廣琺瑯番蓮碗（內填琺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7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黃地花卉方壺一對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28A　清 乾隆 銅胎畫琺瑯小圓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8B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小圓盒一對與木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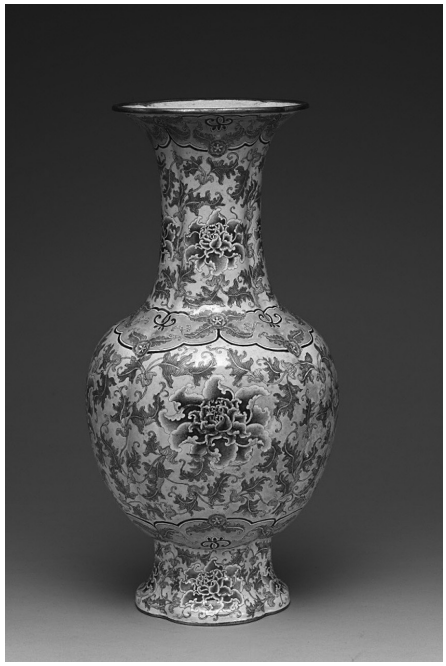




圖29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黃地牡丹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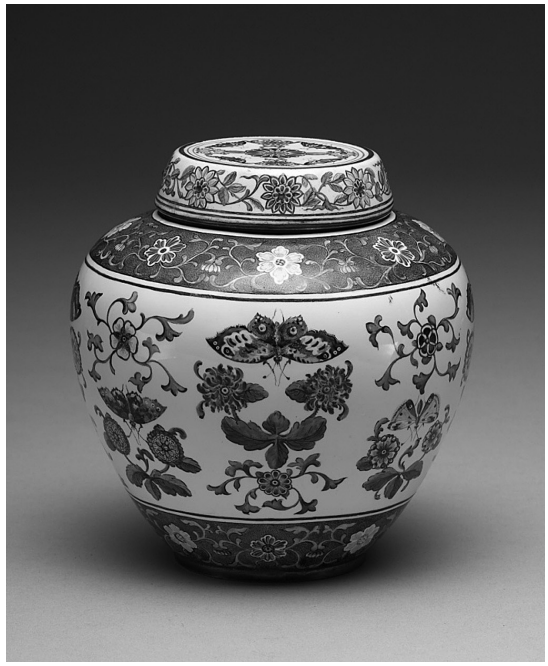




圖30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仿成窯蓋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1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三足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2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荷葉式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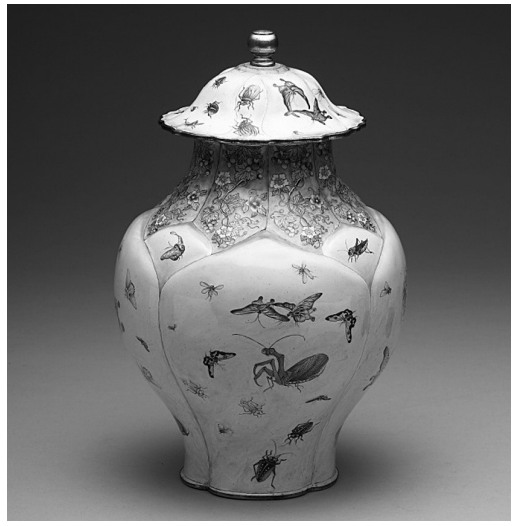




圖33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蓮瓣式蟲蓋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4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海棠式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5 清 十八世紀 廣東琺瑯西洋風景人物盤
Chinese Painted Enamels of the 18th Century, p. 76



圖36 清 乾隆 紫檀木嵌琺瑯邊鑲玻璃畫 引自《清代廣東貢品》圖91-9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7　清 乾隆 銅胎廣琺瑯花式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38　清 嘉慶 銅胎廣琺瑯藍地包袱小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9 清 十八世紀 透明琺瑯八寶紋盆
《清畫琺瑯》圖171



圖40 清 十八世紀 廣東外銷琺瑯高足蓋碗、碟
Chinese Painted Enamels of the 18th Century, p. 6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Imperial "*Guang falang*" of the Qianlong Period Manufactured by the Guangdong Maritime Customs

Shih, Ching-fei; Wang, Chong-ci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Guang falang*" manufactured at the Guangdong Maritime Customs,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Qing imperial court, as a case study of the operational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court's Office of Ateliers (*zaobanchu*) and local workshops. To lend precision to the heretofore vaguely categorized painted enamel metalwares of Guangdong, the first objective begins by analyzing imperial archives and registers, as well as the products themselves and packaging preserved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o determine the scope and appearance of Guangdong enamelware from the Qianlong period. It then proceeds to the Guangdong craftsmen and enamelware brought to court in the Kangxi and Yongzheng eras. The second objective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perial Household Department's Office of Ateliers and the enamelwares manufactured at the Guangdong Maritime Customs, and situates this relationship within the more general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court and regional ateliers supervised by textile commissioners, salt censors, superintendents of customs during the High Qing. These interactions not only showcase administrative considerations of the efficient use of economic capital and local resources, but also highlight the nature of artistic exchanges between the styles of court and region, which involved conflict and mixing.

The primary contribution of the essay is to reattribute as examples of imperial "*Guang falang*" a group of metal-bodied painted enamelwares that were previously misunderstood to be the products of the imperial Office of Ateliers itself. Distinguishing the styl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imperial "*Guang falang*" makes it possible to reconstruct a fuller picture of the role that the Guangdong region played in the manufacture of painted imperial enamelware. This in turn reveals the ar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Guang falang*" as a body of evidence that countervails the notion that imperial and export wares were crafted independently of one another. In addition to clarifying their substantive appearance and process of manufacture, examining these wa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urt-locale interaction provides a basis and reference point for future inquiries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nter and periphery in the High Qing. (translated by Jeff Moser)

Keywords: Qing court, Imperial court, painted enamel, Guangdong Maritime Customs, *Guang falang, Yang falang*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